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创刊语（李彤）

贺刊词（陶坚）

“新型大国关系”与治理: 21世纪的大国体系（庞中英）

国际货币权力与中国的应对（林宏宇）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成绩与问题（王明进）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高祖贵）

多边视角下的中俄经贸关系及发展前景（高飞 张建）

亚太秩序转化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方向（钟飞腾）

用动态思维分析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张弛）

“民主政府”、利益集团与美国贸易政治（董展育）

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中俄能源合作研究（杨超越）

Introduction to the JCIR (Li Xing)

Endorsement of the JCIR (Tao Jian)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Govern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he 21st Century (Pang Zhongy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and China's Response (Lin Hongyu)

Ten Years of the Sino-Europ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Wang Mingjin)

A Study of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slamic World (Gao Zhugui)

The Prospect of Sino-R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ateralism (Gao Fei & Zhang Jia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ia Pacific Order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Zhong Feiteng)

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ang Chi)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terest Group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Dong Zhanyu)

A Study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ang Chaoyue)

Editor in Chief

Li Xing,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Assistant Editors

Peer Møller Christensen,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Ane Bislev,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Lin Hongy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teen Fryba Christensen, Aalborg University

Osman Farah, Aalborg University

Søren Dosenrode, Aalborg University

Wolfgang Zank, Aalborg University

Bjørn Møller, Aalborg University

Birte Siim, Aalborg University

Du Xiangyun, Aalborg University

Poul Duedahl, Aalborg University

Anette Borchorst, Aalborg University

Olav Jull Sørensen, Aalborg University

Tao Jia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ang Mingji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u Hu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 Q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u Sume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o Mi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imothy M. Shaw, Aalborg University

Zhang Shengju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ang Qi,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Camilla T. N. Sørens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Kjeld Erik Brødsgaard,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Hatla Thelle, 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Carsten Boyer Thøgers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lemens Stubbe Østergaard,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Andreas Steen, University of Aarhus

Cecilia Milwertz,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Jørgen Dige Pedersen, University of Aarhus

Signe Overgaard Ptaszynski,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Woody Clark, Clark Strategic Partners, USA

Raúl Bernal-Mez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l Centro de la
Provincia de Buenos Aires

Amado Cervo, University of Brazil

Yang Jiang,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aul Opoku-Mensah, GILLBT, Ghana

黄日涵（封面设计、文稿校对、印制）

崔洋（文稿校对、翻译）

ISBN: 978-87-7112-078-3

ISSN: 2245-8921

Published by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DIR &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Global Studies at Aalborg Universi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Distribution

Download as PDF on <http://dir.cgs.aau.dk>

Design and layout

Cirkeline Kappel

The Secretariat

Kroghstraede 1, room 2.018

Aalborg University

DK-9220 Aalborg East, Denmark

Tel. +45 9940 9150

E-mail: amos@cgs.aau.dk

Homepage: <http://dir.cgs.aau.dk>

《中国与国际关系》第一卷第 2 期目录

ISBN: 978-87-7112-078-3

ISSN: 2245-8921

创刊语（李彤）	i-ii
贺刊词（陶坚）	iii-vii
“新型大国关系”与治理 21 世纪的大国体系（庞中英）	1-10
国际货币权力与中国的应对（林宏宇）	11-16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成绩与问题（王明进）	17-27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高祖贵）	28-36
多边视角下的中俄经贸关系及发展前景（高飞 张建）	37-48
亚太秩序转化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方向（钟飞腾）	49-59
用动态思维分析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张弛）	60-70
“民主政府”、利益集团与美国贸易政治（董展育）	71-86
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中俄能源合作研究（杨超越）	87-94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to the JCIR (Li Xing)	i-ii
Endorsement of the JCIR (Tao Jian)	iii-vii
<i>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Govern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he 21st Century</i> (Pang Zhongying)	1-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and China’s Response (Lin Hongyu)	11-16
Ten Years of the Sino-Europ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Wang Mingjin)	17-27
A Study of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slamic World (Gao Zugui)	28-36
The Prospect of Sino-R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ateralism (Gao Fei & Zhang Jian)	37-48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Order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Zhong Feiteng)	49-59
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ang Chi)	60-70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terest Group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Dong Zhanyu)	71-86
A Study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ang Chaoyue)	87-94

创刊语

李彤

（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主编）

一、出版声明

能在此宣告《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JCIR）的创刊，我倍感荣幸。这是一本学术期刊，由丹麦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rsity）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DIR）与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IR）联合主办。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IR）是丹麦奥尔堡大学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创建的国际性研究机构，是两校学术合作的成果之一。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一年计划发行两期，分别在每年的4月和10月，一期英文一期中文。该期刊以在线开放期刊系统（Open Journal System - OJS）为平台，投稿、评审、修改、刊登都在网上进行。最重要的是通过该平台，全球读者可以阅读到《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的所有文章。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由奥尔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此可以确保该期刊的形象、质量和持之以恒的高学术水准。

二、《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的视角和目标

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福山的“历史终结”吹响的胜利号角渐被世人遗忘，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和其自身的安全与经济，以及欧洲的欧元区这二者所代表的“第一世界”遭受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衰落。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目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诸如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所谓“第二世界”正在重塑国际秩序以适应他们的利益和反映他们崛起的地位。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世界的焦点之一。中国国内社会以及其国际地位的演变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一段新的国际关系时期。对研究人员来说，中国在20世纪和21世纪发生的长期而深刻的转型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研究的理想案例。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国家政策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影响力越来越被世界认可。

面对由美国确立、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辽阔的幅员和其与世界经济政治的融合被视为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已经确立的规范、价值和游戏规则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活力释放了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挑战与结果，对自由世界秩序的运转产生了影响。当今全

球关注的中心之一就是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的转型，以及中国国内的变化如何重塑世界。

基于此背景，《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的重大发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以期给读者带来及时、深刻的分析。对于那些在主流研究中未得到足够关注的问题和观点本刊将格外关注，尤其是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崛起的相关主题。本刊致力于发表中外学者富有洞见力和高水准的文章，致力于激发关于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跨国界时代中扮演的新角色的学术讨论。

无论是青年学者还是资深作者，《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会优先发表那些富有批判力的创新性文章，特别鼓励那些试图在方法论和理论方面做出创新性贡献，并且尝试发展非传统的中式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作者。本刊可以激发不同学科领域的讨论，为表达富有争议和非主流的意见提供一个平台，以促进有历史根基和当代意义的研究。

三、征稿启事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欢迎人文科学领域内有单一学科或跨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就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方面踊跃投稿，欢迎一切涵盖与中国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原创性稿件。稿件在刊登前会经过评审和修改环节。期刊也接受有关书评的稿件。

有关投稿和评审的具体信息请参见本刊主页：<http://ojs.aub.aau.dk/index.php/cir/about> 另外，我很荣幸介绍本刊的3位助理编辑，他们是：丹麦奥尔堡大学的 Peer Møller Christensen 助理教授、Ane Bislev 助理教授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林宏宇教授。

（翻译：崔洋）

贺刊词

陶坚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祝贺丹麦奥尔堡大学（AAU）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院（UIR）协力创办的《中国与国际关系》（中文版）正式发刊。

这是一份定位于反映当代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紧密联系，致力于促进未来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专业期刊。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有效地利用国际和平大环境和经济全球化重要机遇，迅速发展并壮大了自己，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以如此大的规模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并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但要真正做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任重而道远。中国身处急剧变化的世界之中，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强势崛起，世界大国和地区邻国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则是如何以更大的包容性、更强的适应性来应对中国建设性参与国际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驱动力。《中国与国际关系》聚焦的，就是变幻的世界与变化的中国之间正在和将要发生的联系。

这份刊物要搭建的，是让外界深刻理解中国关于世界大势、重要议题和问题看法的高端平台。

日益繁荣与强大的中国，用更坚定的自信、更谦卑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与世界打交道。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¹以此“三要三让”立论为核心，中国的大安全观正在构建成型之中。不久前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用筷子的形象比喻，指出了各个国家对于本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只有互信、共存、合作才能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²，显示中国将以感恩之心回馈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为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最高决策者上述一系列对外重要宣示所表达出的强烈意愿，理应得到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认真对待和积极响应。为此，《中国与国际关系》杂志将紧紧扣

¹ 《人民日报》，2012 年 7 月 8 日，第 02 版

² 《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11 日，第 03 版

住中国的战略脉动，组织高水平专家撰写权威分析论文，要为中国的大战略发声，也让世界精准定位中国。

这份刊物要搭建的，是中外学者常态化交流和沟通的学术平台。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世界大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的期待上升，中国政府对于全面、专业、具体和可操作的对外决策咨询的需求也日渐迫切。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如何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维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介绍推广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中国一流学者提供专业维度的研究与评估。这个研究和评估的过程，离不开与关注中国的国外顶尖学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脑力激荡。《中国与国际关系》杂志将为此提供一个顺畅的沟通渠道。

这份刊物，要办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成果和思想产品的发布平台。

智库引领着思想跃动的节奏，其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与重要性越来越彰显。坦率地说，中国智库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与影响力不强，与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的实际地位远不相称。习近平主席曾专门批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为此，中国各类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应在清醒认识世界发展趋势、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聚焦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和现实国际议题，加强向国际社会提供知识产品的能力建设，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与创新成果，改变“中国主要是使用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的现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并由此打造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群。《中国与国际关系》杂志的面世，可以说恰逢其时，相信这份刊物必能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同进步。

这份刊物，要办成汇聚海外各方智力、传递对华多样声音的国际化平台。

随着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关于中国的研究趋于深入、趋于全面。中国强大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功？富起来的中国变得傲慢了吧——中国到底在追求什么？中国变得富于侵略性了吗——遏制还是与之共处？还有哪些难以应对的挑战——中国有朝一日会被拖垮吗？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会怎样回馈世界——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又分别能得到些什么？国外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分析、引证和结论，都应当及时地和原汁原味地让中国民众和学者们知晓。有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市场潜力，实力增长前景，在世界的自我身份认定，国家利益的定义，价值观，还有中国的外交理念，地区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的角

色，外贸依存度，企业“走出去”，孔子学院，领土争议和安全困境，以及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到的“四大角色”（即中国要做好“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林林总总的事与物，在国外研究者的眼中又是如何描绘、如何解读的？在《中国与国际关系》这本刊物里，国外专家们的多元观点将会得到客观表达和平等商榷。

这份刊物，还要办成中国学者向海外同行讨教取经的学习平台。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中国学界包括国际关系学界，一直秉承和践行着这一学习理念。作为中方主办者，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IR）的全体同仁尤其珍视《中国与国际关系》这本期刊，愿虚心向丹麦和欧洲的学者请教，向海内外的同行学习，争取向国际一流的研究水平和办刊水平看齐。

衷心祝福《中国与国际关系》这株小苗在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同仁，以及各国编委和广大作者的悉心呵护、共同浇灌下茁壮成长。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2013年10月15日

“新型大国关系”与治理 21 世纪的大国体系

庞中英

【摘要】 在 21 世纪初，真实的权力世界既非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统治”，也非“跨大西洋”的西方联合霸权。情况已经并非这么简单。当代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几个大国并存——一个大国体系兴起。显然，大国体系的兴起构成了一个最大的全球挑战。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没有管理大国体系的挑战的解决方案。不过，中国最近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触及到管理 21 世纪的大国体系的议题。管理大国体系确实是这一中国主张的中心目的。为了维持霸权地位，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到亚洲。不过，尽管这一转移可以暂时巩固美国霸权，却无法长远地管理大国体系的挑战。“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获得进展甚至成功，将是中国对于管理 21 世纪的大国关系的一大创新。几乎是不谋而合，该概念即使与一些在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管理 21 世纪的大国关系的思路也十分接近。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对全球的大国体系的治理；新的大国协调

【作者简介】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Govern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he 21st Century

By Pang Zhongyi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real world of powers is neither the so-called unipola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sole superpower, nor the trans-Atlantic domination of the joint Western hegemony. Things are no longer that simple. A fundamental fact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that several great powers co-exist – a great powers system has emerged. Clearly, the emerg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system is a major global challenge.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still no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great powers system. However, China's proposal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touches on the issue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21st century's great powers system. The concept of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still needs time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theoretically.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eat powers system could be the main aim of the concept. In order for

America to maintain its dominant position, America turns towards Asia. However, this may help consolidate American hegemony for a short time but it cannot manage the great powers system on a long-term bas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an be seen as a foreign policy innovation in managing the great powers system. It notices that, like China's new proposal, similar arguments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global challenge posed by a great powers system are emerging in Europe and the Asia Pacific.

【Key Words】“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of great powers system, new concept of great powers

【Author】Pang Zhongying,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导言：“新型大国关系”应适用于大国体系

有人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专指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适用中国与其它大国的关系。确实，中国提议和推动中美关系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¹一些外国评论也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特指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包括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在内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²本文认为，如果真的这样认为的话，“新型大国关系”就遭到了严重误解。

本文认为，从具体外交决策的角度看，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确实最为必要和迫切，但是，“新型大国关系”不应只局限在中美关系。事实上，杨洁篪国务委员最近同时也指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³如果说，“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希冀的中美关系的另一种说法，不适用于中国与其它大国的关系，将会遭致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果认为只有中美之间才适用“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就等于中国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才是大国。这是与世界现实和趋势严重不符的。而美国正好有许多人，尤其是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者”（the offensive realists）常常进行类似中国三国时代的“煮酒论英雄”，认为只有现在的中国和实力（尤其是军力）继续增长的未来中国才有能力或者资格与美国竞争，挑战、取代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假如中国也自我这么认为，将有可能陷入他们的“煮酒论英雄”的危险陷阱——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新型大国关系”也毫无新意可言。

¹ 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 and 实践创新”，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66866.shtml。

² 见（越南）Hoang Anh Tuan, “Snowden saga exposes fragile US-China ties”, *Asia Times Online*, retrieved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CHIN-03-170713.html>。

³ 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 and 实践创新”，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66866.shtml。

如果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仅适用于与美国的关系，可能导致世界其它大国，以及一系列中小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甚至严重恶化，因为这些国家会认为中国打破外交政策传统让中美关系高于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与美国建立起中美合作统治世界的所谓“两国集团”（G2）。

关于所谓“G2”。眼下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美共同管理世界”，或者，确切地说，美国借助中国之力维持其世界霸权，但名义上却是，与中国一起“共同管理世界”。这样的对G2的理解会导致有的人沾沾自喜，然而，从实质上讲，如果没有中美之间关系的趋向对等和对称，也就是“新型大国关系”，何谈G2？目前人们谈论的G2，基本上都是美国或者其他非中国的角度和立场，严重缺少中国角度与立场，实际上，G2只是美其名曰的形式，实质是中国在解决全球问题（包括诸如一些国家的国内冲突）方面协助美国。正因如此，中国早在2009年，即在美国提出“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pivot to Asia）或者后来修改的在亚洲实现战略“再平衡”（rebalancing）之前，中国就正式否定了G2的提议。这一否定是正确的。如果以为“新型大国关系”说是中国版的G2，那么，这几乎是事后诸葛亮，或者刻舟求剑了，因为时过境迁，如今，中国面对的是竭力恢复和维持在亚太和全球的霸权地位的美国，而这样的美国仍然不顾中国等的反对继续单边地武力干涉别国（如叙利亚），中国更无法行G2之实让美国达到这样的干涉目的。

事实上，根据来自中国等的许多战略研究人士长期以来关于世界权力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论述，除了美国和中国，世界上还有一系列的其它大国。大国之间的关系构成大国体系。在大国体系中，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纵横交织、复合结网。本文主张，“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富有创见和远见的概念应该指的是一般的、抽象的大国关系，即国际体系中存在的几个大国（尽管这些大国之间在包括实力在内的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见本文下面的论述）。当然，在具体外交政策制定中，中国特别希望这个概念适用于中美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型大国关系”特别适用于中美关系，并不等于该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与除美国之外的其它大国的关系，更不等于不主张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2012年11月通过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中使用了如下这些关键词：世界进一步走向“多极化”、中国主张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尤其是，“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可见，根据这一为未来5年（2012-2017）确定中国外交

政策方向的报告，“新型大国关系”的原意并不是专指中国希望的中美关系的类型。

可以说，中国要求形成的是“新型”的国际关系，而在新型的国际关系中，主要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显然是最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出“新型大国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国已经与世界一些主要的大国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战略伙伴”、“全面合作伙伴”等关系，这些关系都应视作“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表现、实现形式。也就是说，无论中国与俄罗斯、欧盟、印度、巴西、印尼、南非、墨西哥等全球和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用何种名称，这些关系都属于“新型大国关系”。有的关系，例如中俄关系，几乎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了。此外，在新型的多边合作中，20 国集团（G20）、金砖合作（BRICS）属于典型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促进国际关系 （尤其是大国关系）为适应世界的变化而进行的大转型

由于提出的时间不长，“新型大国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概念化和理论化。“新型大国关系”的初衷似乎只是为了避免与发生所谓“崛起的大国”（中国）和“既定的大国”（美国）之间的注定的冲突（对抗）。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只是规定了一个消极的、最低纲领性质的目标。“新型大国关系”还应该具有积极的、最高纲领性质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应是别的，而是本文建议的促进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为适应世界变化而进行的大转型。

中国等一系列本质上不属于欧洲（包括俄罗斯）和西方（目前仍然不包括俄罗斯）的国家的复兴（“发展”或者“崛起”），尽管仍然缺少自主性和主体性，但是，足以构成对 19 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和西方对全球的绝对与相对主导（控制）的一种改变。中国等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步参加全球化，实际上是“被全球化”（globalized）。现在，与西方发动的、主导的“全球化在退却中”（globalization in retreat）或者进度放慢的同时，中国等国家试图“走出去”，成为非洲和拉美等传统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历史性转变呢？即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将主要由中国等非西方的力量来推动。

从 2013 年就任的中国新领导人的一系列外交讲话和行动可以分析出他们所指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大体上的逻辑。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是

关于“新型国际关系”的，他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⁴在这篇演讲中，“新型大国关系”被放置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大框架下。那些以为“新型大国关系”仅指中美关系的人忽略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这一不可或缺的前提。国际关系从旧的形式与内容转变为新的形式与内容，即新的构造——转型（transformation）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

现存的国际关系类型，如“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单极”的霸权统治、日本为崛起的中国而导致的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巨变而对中国在亚洲进行的“围堵”等等，不仅不能管理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解决前所未有的人类（全球）共同挑战，而且将导致国际关系恶化的保守化，甚至极其严重的倒退，例如人们普遍担心的“强权政治”在 21 世纪初居然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拖延了解决全球性的人类共同问题，加剧了世界危机。

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 1944 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强调了“大转变”（巨变）的必要性，否则，人类文明将趋于衰落和崩溃。⁵回到当下的全球化了的国际体系，受到波兰尼经典思想的启发，本文认为，国际关系在 21 世纪初实现新的转型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中经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开放和崛起、欧洲一体化的扩大与深化、环境和生态危机、大的金融危机（不仅是美欧而且“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如今走到了一个欲进困难、欲罢不能的时刻。全球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的地步。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全球治理的呼吁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全球治理，缓解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的方式居然是全球危机。但危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第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是所谓“单极”，即美国的全球体系，这样的体系与历史上的帝国体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具有许多相似性，当然也有不少差异性，其中之一是，用今天的标准看，历史上的任何帝国均是地区性的（顶多是如奥斯曼帝国那样跨洲的），而美国帝国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的。历史上，帝国的终结都不是因为帝国的外围发生了反抗、抵制、起义，而是因为帝国的中心发生了深刻的危机。2008 年美国发生的危机，是一场深刻的危机。短期看，这一危机似乎并不会导致美国帝国的终结，而且，危机后的美

⁴ 该讲话全文可在中国政府门户网站获得，地址：http://www.gov.cn/j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⁵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译著授权），2013 年。

国政府（奥巴马行政当局和民主党国会）采取了诸如“战略转向亚洲”等一系列措施“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是，如果美国无法解决其内部深刻危机的话，这样的挽救帝国大厦倾覆的外部行动，最终并不会扭转帝国的衰落，更难以管理愈加复杂和困难的大国体系。

二、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路径并非是与美国对话与谈判，而恰恰是与其它大国首先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然后才能迫使仍然沉迷于恢复帝国梦的美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美国的“单极世界”的神坛动摇了，关于“美国（力量）衰落”（American decline）的话语再次被提出来并获得许多严谨而深入的讨论。美国朝野有许多声音嘴硬，不愿意面对现实与趋势，矢口否认“美国衰落”，却在行动上制定与实施战略，试图“维持”和“恢复”美国的全球霸权。标志着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的开始，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顿居然直言不讳地要让 21 世纪的太平洋仍然是“美国的世纪”。⁶不过，美国这种维持和恢复霸权的努力本身恰恰应征了“美国衰落”是真的。

在双边主义方面，美国并不是真诚的。截止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与呼吁，美国的回应并不是积极的、全面的。而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合作方面，号称“世界领导者”的美国，不是拒不参加一些多边协议，就是在执行和落实多边协议方面缺少严肃性。美国的“单边主义”（即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或者依据国内法行军事干涉）直接威胁多边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与美国建立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绝对是不容易的，甚至是极为困难的。那么，到底如何走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文认为，中国可以先行探索、建立与巩固与其他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后才能与美国形成“新型大国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把“新型大国关系”局限于与美国的关系的一个关键理由。

三、“新型大国关系”斗争的三个主要领域

⁶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see: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以下几个议题大国博弈将决定“新型大国关系”最终能否出现。

第一个领域是海洋问题。中国已经郑重宣布决定建设世界“海洋大国”。海洋问题在中国新的外交政策中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非正式峰会（2013年6月8日，加利福尼亚）上指出：“宽广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⁷中国终于正式要求在世界海洋秩序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但是，若此，世界海洋秩序将需要重构。英国、美国、日本，甚至印度，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海洋大国。正是这些既存的世界海洋的大国控制着世界海洋。相比这些国家，尽管海岸线漫长，且为全球主要贸易大国，但是，中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海洋大国，因为不仅从来没有控制过太平洋或者印度洋，而且中国的海洋领土主权及其完整遭到严重侵犯。普遍的观点是，中国距离真正的海洋大国还很远。不幸的是，现存的世界海洋大国，尤其是美、日、印度，对中国的海洋大国战略的反应是對抗性的和竞争性的。危险的是，美日力阻中国成为海洋大国，印度则加强与中国的海洋竞争，这是历史上的大国海洋争夺的旧模式。如果继续如此，则旧的世界海洋秩序容不下作为新兴海洋大国的中国。唯有新型大国关系，世界海洋才能容纳中国。

第二个领域是网络空间的安全。如同美元控制世界经济、美军控制世界海洋，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成为美国霸权的新领域和新方式。在2013年6月发生的斯诺登揭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事件之前，美国把网络安全问题提到与中国关系的优先地位，指责中国是影响美国网络安全的主要外部因素。尽管发生了斯诺登事件，在于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上，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势不减，仍然强调网络安全问题，中美为此建立了“网络安全工作小组”专门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中美能否在网络安全领域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

第三个领域是全球治理。中美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的存在和增长，似乎导致越来越多的中美合作，并且这样的大国合作似乎很像是“新型大国关系”。一些人也误以为，大国之间通过全球治理塑造一种新型的关系。但是，由于全球治理事关“谁主导国际规则”、“谁的世界秩序”这样的根本的国际政治问题，在实质上，全球治理上的大国关系未必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和欧盟一直牢牢控制着国际金融秩序。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仍然不影响美欧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的主导性。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决策权（话语权）即使有所提高，也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

“新型大国关系”的成败取决于上述的海洋、网络 and 解决全球问题等领域能否形成真正

⁷ 杜尚泽：“习近平：宽广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人民日报》，2013年6月8日

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

四、“新型大国关系”是管理 21 世纪的大国关系的必由之路

在大国之间的争夺下，到底如何管理大国关系？这是一个挑战。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国际关系管理上的方法论创新。本文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其实就是中国版本的大国协调理论。调查和比较一下这些年来国际上的同类主张，就能发现，中国的这一创新并不孤立，不是空谈。在国际上，有不少与“新型大国关系”之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即使与一些在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管理 21 世纪的大国关系的思路也十分接近。

以下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本文作者作为主要研究员参加的由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组织的“21 世纪的大国协调 (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⁸”。该项目的总的结论性观点是，世界充满了问题、挑战和危险，需要和抓住机会建立“大国多边主义”，不仅管理大国关系，而且实现全球治理：“在全球政治中权力转移的关键时刻，让大国关系没有节制和让大国因为为他们之间存在的争端而斗争，是极其危险的。来自外部的对各大国的制衡，或者让各大国服从于一个全球性的权威，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辅之以核武器威慑力量的均势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则是太不稳定和风险太大。几乎唯一的具有活力的解决方案是由嵌含 (embedded) 在重新发起的全球多边主义的大国协调而导致的自我克制和相互适应：第一，新旧世界大国在任何一种浮现出来的世界秩序上均有自己的声音，且受到其它较小一点的国家承认而具有国际正当性；第二，在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遗产不同的大国应该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共存共荣；第三，在现存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应该有一些论坛让大国进行非正式的协商；第四，大国之间应该培育相互谅解与共同的国际责任感；第五，阻止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等冲突；第六，保持节制基础上的政治均衡，接受其他大国的‘正当的利益’，承认安全是相互依存的；第七，为在安全领域的共同行动提供便捷；第八，创造为解决其它的

⁸ 关于该国际研究项目的介绍见：

<http://www.hsfk.de/A-Twenty-First-Century-Concert-of-Powers.763.0.html?&L=1>。

治理问题的集体行动的前提。”⁹

第二个本文要提到的是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这位研究亚太地区安全的由前国防部官员转变的学者这些年来一直主张亚太地区的大国协调。怀特出版了在西方颇具争议的《对华选择》(*China Choice*)一书。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建议美国在“回归亚洲”的过程中与中国“分享权力”,以便与中国一道“共同领导”这个地区。进一步地,怀特认为,一个由美国、中国、日本及印度组成的“亚洲协调机制”(concert of Asia)能够带来亚太地区的新秩序。¹⁰有关美国正在亚洲执行的“再平衡”战略,怀特认为,美国不能逼得中国太紧(pushing China too hard)。美国要“遏制”中国其实超出了美国的实力,美国轻易就能够做的则是平衡中国的影响同时与中国一道维持地区秩序。

结论：大国协调，缔造世界的长期和平、稳定与繁荣

本文讨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般性,尤其是其实质是管理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新思路和新方式。本文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不应仅指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设定的目标。本文论述了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是与美国之外的其它大国先行“新型大国关系”,然后也许才能迫使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人当然要断然否定这样的东西,不会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迟早会认识到,需要管理起相对衰落的超级大国地位,¹¹而且在许多方面无法不与中国合作。

本文还分析了海洋争端、网络安全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为何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几个主要战场。如果中国不打算在海上发展,则注定不会有海洋问题。问题是,全球化的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唯有成为新的海上强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大国无法接受美国对网络安全的霸权监管,而要求建立网络世界新秩序。

最后,本文认为,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主张绝对“不孤”,而是有大量“同声”。这说明“新型大国关系”自然有其理由或者宿命(raison d'être)。19 世纪欧洲历史上前所

⁹ 见德国和平研究员主持的国际研究项目《21 世纪的大国协调》即将发表的报告《21 世纪的大国协调:促进后大西洋时代的大国多边主义》(A 21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 Promoting Great Powers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Post-Transatlantic Era)第一章结论部分。

¹⁰ Hugh White, "Time for a Small Meeting of Big Powers",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19 September, 2012.

¹¹ 吉迪恩·拉赫曼:“美国该学会面对衰落”, FT 中文网,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见:
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291。

未有的“百年和平”（1815-1914）的主要原因正是来自当时的欧洲大国之间的协调。¹²受此启发，“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获得成功，因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和金融基础在过去20年（1992-2012）因为深入而复合的全球化而基本奠定。

¹² 有关这一“百年和平”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本文提及的卡尔波兰尼的《巨变》一书的第一章是以《百年和平》为题。本文认为，这是今天我们理解和研究“百年和平”为什么成功的一篇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之作。

国际货币权力与中国的应对

林宏宇

【摘要】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权力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议题，在当前及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或将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和出发点。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将以各自大陆主体板块为地缘政治依托，以区域经济整合为地缘经济依托，逐渐形成三大国际货币权力板块。而且，这一过程将伴随着三大货币权力板块之间的地缘政治经济碰撞。国际货币权力的分化与重组将对大国关系、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乃至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将从经济基础上加速 21 世纪上半叶国际大格局的转型。在这个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中国的重要应对之策。

【关键词】 国际货币权力；国际格局转变；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 林宏宇，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and China's Response

By Lin Hongyu

【Abstrac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has become a new area of interes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USA, the EU and China will pursue global monetary power in the future, and the USD, the EURO and the RMB will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world reserve currencies.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will shift from a unilateral-hegemony structure to a triangle-balance structure. This shift has a very strong influence on change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s the largest emerging economy, China will speed up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RMB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uthor】 Lin Hongyu,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IR)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治理问题也成为了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重中之重”与“难中之难”。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货币权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渐由隐性变成显性。美国为了维护其趋向衰弱的霸权，不顾世人谴责，连续 4 轮“量化宽松”（QE），助纣“欧债危机”，诱导英镑、日元“堕落”，不断

打压黄金地位。通过这些货币金融举措，美国止住了美元颓势，稳住了国内经济，其虽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国”却开始率先走出危机。为此，国际货币权力问题日益吸引人们的眼球。那么，何谓国际货币权力？它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未来将如何转型？中国将如何应对呢？

国际货币权力是指国别货币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它主要表现为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通过其货币跨越本国国界，在区域国际(regional area)乃至全球范围(global area)相对地或绝对地行使货币的一般职能，即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存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于一身，对区域国际乃至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特殊的影响。“国际货币权力是大国或国家联盟综合实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运用货币权力来获得体系内的不对称优势，操控特定时期的国际体系资源，左右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变。”¹

近代以来，国际货币权力经历了“黄金-英镑”本位制、“黄金-美元”本位制、“石油-美元”本位制 3 个阶段。大约运行在 1870-1914 年之间的“黄金-英镑”本位制是国际货币权力的初始阶段，该体系是英国霸权鼎盛的体现，对于维持当时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美国与德国的崛起，英镑货币权力的地缘范围日益收缩并逐渐失去国际平台支撑，而美元的运行平台则逐渐扩大，1944 年 7 月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标志着“黄金-美元”本位制的诞生，这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成长阶段，同时也标志着英国向美国让渡霸权。然而，1971 年 8 月尼克松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3 年后美国与沙特政府达成“以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的协议，美元与石油挂钩，从此确立了“石油-美元”本位制，这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成熟阶段，也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最高阶段。通过“石油-美元”本位制，美国结束了“美元危机”，美元获得了国际大宗商品和战略物资的定价权，使大宗商品出口国赚取的巨额美元最终以资本流入的方式回流到美国，从而不间断地维系美元的霸主地位。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又利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机，将“石油-美元”的作用平台拓展至世界各个角落。

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力，美国可以实现对全球经济的“远程遥控”。“美联储”扮演了“全球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通过操纵货币发行量、币值升降与汇率调整就可以“合法”地实现对全世界的“金融统治”，剥削全球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掠夺全球财富，实现所谓的“金融殖民”。换句话说，美国通过没有任何价值而只有美国国家信用担保的美元来换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财富，这是全球化时代金融掠夺的典型体现，构成了“金融殖民”的

¹ 林宏宇、李小三：“国际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第 6 页。

本质特征——通过操纵美元的发行和币值的升降来获取全球超额利润，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繁荣”，而当美国国内发生经济危机时，它又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将危机转嫁出去，形成所谓“危机是美国的，损失是全世界的”怪现象。“美国通过出售国库券就可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²。正是凭借着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力，“2002年，美国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市场规模膨胀到106万亿美元，2004年达到258万亿美元，2007年已达到近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的价值是美国GDP的35倍”；另外，“截至2008年6月，美国全部债务总和达到53.2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全世界GDP总和，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承担美国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³，于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可以说，肇始自美国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本质是“石油-美元”本位制的危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亟待改革。

未来国际货币权力格局将如何转型呢？笔者认为，未来国际货币权力将面临美元、欧元与人民币“三家分晋”之态势，“三币鼎立”将是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未来走向，国际货币权力格局将从“一币霸权”结构走向“多币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21世纪上半叶，美元还将是全球第一大货币，但其国际货币权力将逐渐弱化并开始让渡；欧元则处于由区域性国际货币权力向全球性国际货币权力转变的过程中；人民币则处于获取国际货币权力的最初阶段——国际化的进程中。可以说，这三大货币权力彼此消长的过程也就是国际货币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从长远来看，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将会逐渐动摇，最终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币鼎立”的国际货币权力格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由“霸权”结构向“均势”结构转变。

虽然美元、欧元、人民币这三大货币决定了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未来走向，决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框架，但框架内部的其它重要货币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待观察。根据当前各大国综合实力与国别货币权力的对比，笔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2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三层结构”向“两层结构”转变之势。所谓的“三层结构”是指美元处在第一层，欧元与人民币处在第二层，日元、英镑、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巴西的雷亚尔等处在第三层。随着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进一步转型调整完成后，“三层结构”将转变为“两层结构”，即美元、欧元、人民币同处在第一层，日元、英镑、卢布、卢比、雷亚尔等货币

² [美]廖子光（Henry C.K. Liu）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4月版，译序第11页。

³ 黄飞鸣：“金融衍生品、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
<http://www.studa.net/jinrong/100124/14223289.html>。（上网时间：2013年6月8日）

处在第二层的总体结构，这个结构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当前，经济区域化、全球化趋势继续向纵深发展，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机遇与挑战。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⁴，这是对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宏观国际环境的准确定位。这样的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和平路径的可能性。面对上述国际货币权力格局未来可能的转变，正处于和平崛起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不二选择。未来几年我国应不断提高科技化与国际化水平，努力壮大自身经济规模，并以此为依托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争取最终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之一，成为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一极，实现对国际货币权力的分享。

从具体来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既存在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表现为 3 点：

1. 国际资本的亚洲流向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外部支撑。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欧日等国重点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与虚拟经济产业，加速将低端产业、加工制造业和过剩资本向第三世界特别是亚洲区域转移，全球形成“虚拟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产业”的分工。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正处于“实体经济产业”带上，国际资本与其他经济要素持续向该地带流动，这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外来经济资源的支持。当前我国应重点做好“对外贸易依赖型”向“内需整合提高型”的转化工作，以此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大后盾。

2.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持续动力支持。从美元货币权力的成长历程来看，它主要获益于战后美国国内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美国经济发展的历次高峰都是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支撑的，如“二战”后初期到 60 年代的“黄金发展期”是由电子科技革命带动，20 世纪 80-90 年代则是依靠信息产业、网络技术促进了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正是科技的持续突破为美国经济和美元提供了强力支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理，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中国经济的持续走强，归根到底，则要求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科技水平得到提升、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进程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持续动力。

3. 东亚经济一体化趋向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地缘经济依托。21 世纪世界地缘格局

⁴ 《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http://www.ce.cn/macro/more/201103/16/t20110316_22304698.shtml，上网时间：2013 年 6 月 10 日。

的基本趋势是亚洲迅速崛起为全球另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当前，区域一体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地缘经济依托在大国战略角逐中的份量越来越重，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已积极建构地缘经济依托，如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欧盟的“地中海联盟计划”等。因此，需要用地缘经济视角来观察国际政治，从根本上把握大国战略的现实走向。对于中国来说，不断深化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地缘经济依托。我们应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为依托，推动人民币跨越周边层次、亚洲层次和国际层次这三层地缘空间，由近致远，最终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当然，由于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TPP 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但笔者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不出大问题，这两个障碍将随着中国倡导东亚自贸区建设的推进而克服。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主要的不利因素如下：

1. 面临着美元货币权力板块的强大挤压。在亚太区域，人民币还不具备欧元货币权力板块的实力，因此，美元货币权力板块对人民币的压力更为明显，其激烈程度将超过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同质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将更多的表现为地缘政治经济上的交锋。美元板块与人民币板块交锋的碰撞处形成一条亚太地缘“冲突弧”，而这条地缘“冲突弧”恰与“第一岛链”国家（地区）重合。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周边化国际化进程中，首先触及的就是这条亚太地缘“冲突弧”。因此，对美国而言，要打压和阻断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就必须将人民币的货币权力控制在亚太地缘“冲突弧”之内。故而，激发亚太地缘“冲突弧”以冲击人民币货币权力的地缘政治依托和地缘经济依托则成为美国施展“巧实力”的首选。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如何利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转型的机遇，如何在美元与欧元板块之外做大做强人民币，如何规避亚太地缘“冲突弧”的风险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地缘经济依托，就成为我国一项空前紧迫且异常突出的战略任务。

2. 面临着欧元、日元、英镑的战略延阻。从现实主义“权力转移”（power-shift）和“零和博弈”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获得货币权力并能参与制定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和分配世界资源，那么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权力将受到削弱，因此，阻止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后四种货币的共同目标，除了上述美元货币板块压力外，欧元、日元、英镑等西方强势国别货币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形成战略延阻。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为重要依托，这使中国经济与人民币独立性受到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增加，美欧日等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货币战”与“汇率战”等更是常态。对于人民币来说，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过于强势的欧元和过于弱势的美元都不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对人民币而言，欧元与美元在西方资本体系里的“内

耗”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另外，笔者认为，为了打破欧元、日元等西方强势货币的延阻，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增大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依然是许多大宗商品（如铁矿石、石油等）的最大需求国和某些战略物资（如稀土）的供应国，我们应充分利用这种贸易地位，通过货币互换等形式，加大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同时，积极利用美国打压黄金的机会，加大黄金的国家战略储备，为未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奠定坚实基础。

从总体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中国获取国际货币权力和世界体系权力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数据已不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国际经济利益及其分配格局……也许中国赚取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攻击的目标，而‘利润’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的‘囊中之物’”⁵。中国要想摆脱这种“金融奴役”的尴尬地位，就必须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乃至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获得国际货币权力，以此保障自身作为“全球工厂”角色而理应获得的世界平均利润。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将是中国战略崛起的标志之一。

总之，在当前及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或将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和出发点，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将以各自大陆主体板块为地缘政治依托，以区域经济为基础整合为地缘经济依托，逐渐形成三大国际货币权力板块，这一过程将伴随着三大货币权力板块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经济碰撞。国际货币权力的分化与重组将对大国关系、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乃至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将从经济基础上加速 21 世纪上半叶国际大格局的转型。

⁵ 余颀、李晓锋：“析目前中美经贸关系”，陈佩尧、夏立平主编：《国际战略纵横》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76 页。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成绩与问题

王明进

【摘要】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0 年来双方关系取得巨大成绩，但也经历了许多波折，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充分显示了出来。面对中欧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有人甚至怀疑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真实性。近年来中欧关系出现的波折，主要是由于中欧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增强所致。在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中欧关系出现矛盾和分歧的真实原因，管控矛盾，在彼此适应中进一步增强关系，促进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中欧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人权问题；贸易争端

【作者简介】 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Ten Years of the Sino-Europ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By Wang Mingjin

【Abstract】 Ten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this relationship has continued to flourish. However, publicly they have often been at odds, and even created doubts about the real existence of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drawbacks of this relationship in recent years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increased competitiveness in economy and trade, and the outbreak of quarrels concerning human rights and other areas. Since Sino-EU rela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parties and the world in general, both sides should find ways to control their conflicts and thus pave the way for thei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to further flourish.

【Key Words】 Sino-EU relations,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human rights, trade disputes

【Author】 Wang Mingjin,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今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 10 周年。2003 年中欧确立发展全面战略性伙伴关系前后，双方关系密切，有人甚至认为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¹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双方对发

¹ David Shambaugh, "China and Europe: The Emerging Axis",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2004(vol.29, No.9),pp19-20.

展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给予了过高的希望，特别是近年来，中欧双方的矛盾与纠纷频现，中欧双方都出现了失望的情绪。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虚多实少，²而欧方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双方合作重点仍然在商业贸易方面，中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³但是，中欧双方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领域联系密切的程度也前所未有的，简单地怀疑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明显脱离现实。我们应该对过去 10 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有一个全面的充分的评价，促进中欧关系在健康稳定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一、应充分肯定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和成绩

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中欧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这既是中欧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展演变所决定的。全面评价这一时期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首先要充分认识中欧关系发展的基础和成绩。

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关系的一次飞跃。中国和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 1975 年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受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动荡的影响中欧关系出现了非常短暂的挫折，但双方在 90 年代初很快又加强了联系。1994 年欧盟发表《走向亚洲新战略》政策文件把欧盟同中国的关系列为重要构成部分。1995 年欧盟通过了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奠定了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1998 年 6 月，欧盟通过《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确立了中欧伙伴关系。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1975 年双方贸易额只有 24 亿美元，到 2000 年，双方贸易额已达到 690 亿美元，到 2003 年又快速增长到 1252 亿美元，增长速度惊人。⁴中欧人文交流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科技教育合作项目得以展开。

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演变促进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国与欧盟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一直把欧盟作为世界力量当中的一极，致力于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冷战结束后，中国更是积极推动多极力量的发展，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欧盟则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多边主义，与中国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战略形成呼应。中欧双方都对 2003 年美国发起的伊拉

² 参阅叶江：“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面临新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1-9 页；冯怡然：“中欧关系：问题与建议”，《当代世界》，2013 年第 8 期，第 65-67 页。

³ Jonathan Holslag, “The elusive axis: Evaluating th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1 Vol. 49, No. 2, pp. 293-313.

⁴ 1975 年为欧共体 9 国的数据，2000—2003 年为欧盟 15 国数据。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出版社）历年数据整理。

克战争表示疑虑。“中国是国际舞台上一支崛起的力量，而欧盟则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双方都主张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建立国际新秩序，双方的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⁵除了双方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有相似的理念外，双方还存在相互接近的共同战略利益。欧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将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巨大的市场，必须从战略层面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对欧洲的资金和技术需求也非常强烈。

2003年9月，欧盟公布了第5个对华政策文件《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挑战》。同年12月，欧盟发布的《欧洲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欧盟的六个战略伙伴之一。中国也于同年首次发表对华政策文件，双方在构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形成有效呼应。2003年底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正式确认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12月，中欧领导人会晤认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在“迅速走向成熟”。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绝非有名无实，而是有着深刻的实际内涵。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欧盟总部时对这一概念作了具体阐释。他说，所谓“全面”，是指双方的合作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既包括经济、科技也包括政治、文化，既有双边也有多边，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所谓“伙伴”，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⁶中欧双方自确立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人文交往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首先，双方高层政治往来密切，沟通的渠道在增加。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后，双方的对话构成机制不断完善。早在1998年确立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正常展开，双方在2005年建立了副部长级的战略对话机制，在2007年启动了中欧伙伴合作协定的谈判，2008年启动了副总理级的高层经济对话机制，在2010年建立了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机制，2012年启动了中欧高级别人文对话交流机制。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为三大支柱，80多个合作机制为配套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话合作格局，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科技、能源、

⁵ 阮宗泽：“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从构想到现实”，《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68-73页。

⁶ 吴绮敏等：“积极发展中国同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04年5月7日第1版。

环境等各领域。

其次，中欧经贸往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欧盟自 2004 年以来就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欧盟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2006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07 年开始，欧盟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中国产品的最大市场。就欧盟对中国的出口而言，中国在欧盟的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 2005 年的 4.9% 上升到 2008 年的 6.6%，2009 年则进一步上升到 7.5%，成为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3 年，中欧双边贸易额刚过 1000 亿美元，2011 年则达到 5678 亿美元，2012 年尽管有所下降也达到 5460 亿美元的高位。

第三，中欧科技、能源、文教等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2004 年中欧双方续签了《中欧科技合作协定》，2003 年中国同欧盟签署了《伽利略计划》合作协定，成为第一个参加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2009 年双方签署了《中欧科技伙伴计划》。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参加欧盟科技框架下的 400 多个项目。在能源合作方面，双方在 2004 年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研发合作协定，2005 年建立了中欧能源交通战略对话机制，2009 年又签署了《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财政协议》和《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合声明》，2012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高层能源会议宣布建立中欧能源消费国战略伙伴关系。在文教和青年交流合作方面，2003 年中欧签署了关于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联合声明，2010 年开始了“中欧文化高峰论坛”，2011 年“中欧青年交流年”和 2012 年“中欧文化对话年”成功举行。近年来，欧盟各国来华留学人员不断增加，2012 年全年欧盟 27 国有 3.54 万人来华留学，而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在欧盟国家留学人员总数已达 24.29 万人。到 2012 年底，中国还在欧盟成员国中建立了 105 所孔子学院和 107 个孔子课堂。⁷

当今中欧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双方相互依存的程度，要远远高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之前。双方都提升了中欧关系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深化了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有利于双方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国际关系格局的稳定。

二、不能忽视中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既要看到双方关系发展的成就，也不能掩盖双方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中欧全面战

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640/sbgx_607644/。访问日期 2013-09-10。

略伙伴关系建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预料的那样顺利发展。中欧双方遗憾地发现，双方在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出现了不小的麻烦，在以往进行合作的领域已经出现了竞争关系，在中非关系等新的议题上发生了争端，以往受控的争端领域再起争端，公众对对方的态度明显恶化。⁸中欧关系出现了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相符的局面。

首先，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继续维持对华军售禁令。中国非常希望能够在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解决这两个问题，而欧盟在 2004 年底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声明里也表达了“对武器解禁和推进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意愿”。这两个问题完全是不符合时宜的历史产物。冷战时期，美欧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作为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依据。尽管 1998 年后欧盟已将中国排除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之外，但并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而是把中国作为“特殊市场经济国家”来对待。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欧盟要求中国接受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条款和特保条款，直到 2016 年，从而为欧盟利用这些条款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提供了方便，使中国成为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是冷战结束前后的政治动荡时期欧洲对华施加压力措施之一，以促使中国发生符合西方设想的变化。该措施在禁止欧盟成员国同中国进行军工产品贸易的同时，也使中欧双边军民两用产品与技术的贸易和高新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深受影响。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与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实际不相符，被人们认为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两大政治障碍。但实际上，欧盟至今为止也没有在这两个问题上让步，使得欧盟作为中国战略伙伴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其次，价值观外交使中欧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摩擦加剧。政治制度的差异是制约中欧关系发展的长期因素。欧盟之所以能够在冷战结束后迅速与中国发展关系，其原因之一就是试图使中国发生其所期望的那样改变。“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希望通过接触与合作，将中国完全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之中，并在欧盟的理念和规则下，与其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在中国内部，通过政治对话，实现欧盟所期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

⁹但中国并没有发生欧洲所期望的那种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便从以前的“无条件接触政策”¹⁰退却，转而从各方面向中国施压。这突出体现在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换届后实施的“价值观外交”上。德、法等国的新领导人上台后迅速修复了因伊拉克战争而

⁸ 陈志敏：“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16 页。

⁹ 金玲：“欧盟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化’”，《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40-49 页。

¹⁰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2009 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将此前的中国与欧盟接触称为“无条件接触”，主张转变为“互利接触”。参见 John Fox & Franc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ECFR Policy Paper*, April, 2009.

受损的欧美关系，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新的力量变动。随后，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不断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中欧之间制造矛盾和纠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2007 年 9 月在德国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这在德国历届总理中是第一次。法国总统萨科齐在 2008 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2012 年也不顾中国政府的交涉和警告，会见达赖喇嘛，对中欧之间的政治关系造成重大损害。2008 年西藏发生“3.14”大规模骚乱后，欧洲国家亲达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歪曲报道，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严重干扰了当年 4 月在伦敦和巴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而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居然还以是否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向中国施压。

第三，中欧经济贸易摩擦明显增加。中欧贸易失衡问题近年来成为中欧纠纷的爆发点。2000 年中方顺差为 73.4 亿美元，2008 年增加到 1601.8 亿美元，此后中国加大了从欧盟的进口，顺差有所下降，但仍维持高位，2011 年仍高达 1448.3 亿美元。¹¹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包括欧盟对华武器禁售、欧盟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等。例如，2010 年 1-6 月，中欧高科技贸易总额为 650 亿美元，中国出口至欧 485 亿美元，从欧进口 165 亿美元，¹²中国对欧出口值远大于从欧进口值，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集团的贸易中是非常不正常的。另外还需看到，尽管中国对欧贸易存在较大顺差，但由于中国产品取代了亚洲其他国家产品，欧盟对亚洲的贸易总体上是平衡的。¹³但这在欧盟却激起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认为中国是最大的不公平贸易的发源地，对中国商品实施大量反倾销调查及其他贸易救济措施。近年来，欧盟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有 35%是针对中国的。2009 年欧盟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7 起，占其总立案数的 58%。2010 年欧盟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发起 11 起贸易救济调查，是 2009 年的 1.6 倍。2011 年 5 月，中国产铜版纸受到“反倾销”“反补贴”双反调查，贸易纠纷进一步升级。2012 年 1-10 月，欧盟共发起 11 起反倾销调查和 3 起反补贴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反倾销调查 3 起，反补贴调查 2 起，均居各国产品首位，其中欧盟于 2012 年 9 月 6 日宣布对我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超过 200 亿美元。此外，欧盟还对中国商品采取了其他更为严厉的贸易救济措施和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手段，例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

第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欧洲批评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援助尤

¹¹ 数字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访问日期：2013 年 9 月 5 日。

¹² 郑腊香：“欧债危机下政治因素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2 年第 8 期，第 60-69 页。

¹³ 冯仲平：“新形势下欧盟对华政策及中欧关系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2 期，第 1-5 页。

其是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这引起了一直把非洲视为自己后院的欧洲的警惕，担心中国冲击其利益，对中国的对非援助颇有微词。首先是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例如前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 2006 年访问尼日利亚时表示，“中国现在在非洲做的一切，多是我们 150 年前在非洲做过的。”¹⁴欧洲议会 2008 年通过的《关于中国的非洲政策及其影响报告》则指责中国援助非洲就是为了攫取石油等自然资源。¹⁵其次，批评中国对外援助原则。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在对外援助方面也是如此，“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¹⁶欧盟则指责中国的对外援助无视环境标准和社会标准，抵消了欧盟在非洲推广自由民主人权等“良治”方面的努力，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是对欧盟等西方国家援助模式的破坏。¹⁷这些指责恶化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加了对非援助的成本，使中国对非援助政策面临一定的调适压力。¹⁸另外，欧盟还指责中国与缅甸、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是支持独裁，助长贪腐。

第五，欧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近年来，中国在与欧盟国家进行正常的经济交往中往往会遇到将正常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情况。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大对欧洲的投资，帮助欧洲走出困境，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投资行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2011 年 7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正在买断欧洲”，显示了对华的认知偏见和明显的不信任感。欧盟委员会工业委员塔加尼建议建立一个专门审查外国在战略部门投资的机构，重点监督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他认为：中国企业投资有核心技术的欧洲企业是一种政治战略，欧洲必须从政治上予以还击。¹⁹欧方将中欧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态度，使本希望与欧洲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中国感到困惑，干扰了中方的决策，阻碍了双方在经贸投资领域进一步的合作，减弱了中国参与解决欧债危机的愿望。

此外，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其他很多问题上还存在矛盾和认识分歧，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形成或大或小的影响。

中欧之间出现上述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双方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都

¹⁴ 转引自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4 期，第 6-15 页。

¹⁵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on China's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Africa, Strasbourg, April 23, 2008.

¹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 年 4 月。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4-21/2989430.shtml>。访问日期：2013 年 8 月 25 日。

¹⁷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on China's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Africa, Strasbourg, April 23, 2008.

¹⁸ 朱贵昌：“试析欧盟对于中国援外政策的影响”，《国际论坛》，2012 年第 4 期，第 44-48 页。

¹⁹ 房乐宪：“欧洲智库对华认知的近期倾向——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 年第 1 期，第 95-104 页。

存在过高的期望。中国方面希望通过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解决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和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欧盟则希望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使中国发生符合西方规范的转变。当这种期望落空时，便难免失望，这可能正是所谓的中欧关系“蜜月期”在 2006 年快速结束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则是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欧经济之间的竞争性在增加，欧盟对中国发展的警惕性增加，导致其采取更富有进攻性和竞争性的政策，其突出体现就是欧盟在 2005 年以后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向“经贸化”方向发展。²⁰

尽管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主要推动力，但自 1995 年欧盟第一个对华政策文献出台后，中欧一直努力发展有国际政治和安全维度、超越经贸关系的双边关系。2003 年中欧双方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明确了中欧关系的全球战略维度。但 2005 年欧盟在重启《里斯本战略》时，将经济增长和就业作为经济社会改革的首要目标，中欧关系则作为里斯本战略的对外维度服务于这一目标。而正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越法国和英国，在欧洲引起担心，经过媒体的炒作，成为一种公众情绪。在此背景下，欧盟第六份对华政策文献转向强调中国开放市场和保证公平的市场竞争方面，强调与欧盟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例如能源、气候变化以及经贸等问题将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战略优先，双方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被放在了次要地位。²¹2010 年 12 月 17 日，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在向欧洲理事会作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评估报告时认为，欧盟难以改变中国，中国在一定时期内无法满足欧盟的人权和法治标准，双方应该在具有共同立场的领域寻找共同利益，强调欧盟对华战略优先是“更加公平和自由的中国市场准入”。²²近年来中欧双方对中欧关系抱怨的不同也显示出欧方对经贸问题的重视。与中国主要关注欧方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维持对华军售禁令和欧盟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不同，欧方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欧洲贸易逆差、知识产权、市场准入、产品安全和中国对非洲援助等问题上。²³

这样看来，近年来中欧关系出现摩擦和波动并不是中国的民主或人权出了问题，问题出现在了经济上。事实上，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再指责中国人权事业出现了倒退或恶化近乎荒谬。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中国国家实力迅速增加的背景下，欧盟对中国的担心

²⁰ 金玲：“欧盟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化’”，《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40-49 页。

²¹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U-China: Closer Partner,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http://eur-lex.europa.eu/LesUriServ/site/en/com/2006_0631en01.pdf. 访问日期：2013 年 9 月 5 日。

²² 袁雪：“市场准入：欧盟对华核心利益之首”，《21 世纪经济报道》，<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21/2NMDAwMDIxMTc2NA.html>. 访问日期，2013 年 8 月 25 日。

²³ 赵晨：“中欧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新视野》，2008 年第 2 期，第 94-96 页。

增加，引起了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问题的突然发酵。“在引起这一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欧方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最为重要。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中欧经贸关系中新出现的竞争性。”

24

三、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之后，仅仅经历了非常短暂的蜜月期，很快就陷入了各种矛盾和纠纷之中。这里面既有双方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现实利益的考虑；既有长远战略意图的冲突，也有短期的纠纷和摩擦。但从长远来看，中欧双方对对方都有长远的战略需求，双方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因此，尽管双方在现实中仍将存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仍然会在差异和竞争中向前发展。

首先，双方有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地缘政治条件和广泛的战略合作空间。中欧之间相距甚远，没有历史问题、边界问题的困扰，双方有相对超脱地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地缘政治条件。双方合作的战略意义非常明显：中国和欧洲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欧必须开展全面、积极的合作，这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欧盟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中欧必须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中欧在当前国际体系的塑造上有共同的战略需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而欧洲也认识到促使中国同国际秩序的对接是明智的选择，欧洲主张的有效的多边主义同中国主张的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其次，双方合作具备良好的基础。一方面，中欧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经贸关系，而双方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互补性很强。从贸易结构上来看，中国向欧盟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五金工具、钢铁制品、照明装置、家具以及服装、纺织品、鞋类、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普通轻工产品，而欧盟输往中国的则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如飞机及零配件、有机化学品、汽车、船舶等。可见，双方进出口商品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双方的贸易量 2011 年以后已经超过 5000 亿美元，已经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另一方面，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框架。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启动，

²⁴ 冯仲平：“中欧需要建设性接触”，《欧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59-67 页。

中欧双方合作的基础将得到进一步拓宽。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充分肯定。中国历来重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问欧洲和欧盟机构,阐述了中方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立场。温家宝总理 2012 年出席了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与欧方达成了《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²⁵尽管欧洲政界精英以及学者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充满了怀疑,但欧盟仍然充分肯定中欧关系的战略地位。2010 年欧盟领导层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了全面评估,阿什顿向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递交了欧盟与战略伙伴的关系报告,报告排列的欧盟的战略伙伴的次序为: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南非,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欧盟战略伙伴中的地位。²⁶因此,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双方的共识。

不可否认,从中欧关系近期发展的趋势来看,中欧关系在进一步加强的同时,竞争与挑战将越来越成为中欧关系中的关键词。从欧盟对华政策的角度来看,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欧盟图谋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长远目标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在中欧关系的具体层面,欧盟将会更加务实,中欧关系的“经贸化”是基本趋势,“利益置换”²⁷将成为基本手段,合作与竞争将成为中欧关系的主题。欧盟自视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特别重视利用规范和标准来影响和塑造世界。而随着中国从低技术的制造业和组装业向高技术产业的转移升级,中欧关系的竞争性也会进一步增强,欧盟规范全球化以及增加“第三方市场准入”的目标将重点指向中国,中欧在贸易平衡、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摩擦和纠纷将可能进一步增加。由于欧盟将推广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人权、民主等定位为其对外关系的重要目标,甚至定位为“核心利益”,中欧在价值观上的博弈仍将继续,利用“利益置换”手段,向中国施压促变仍是欧洲的重要选项,经济贸易争端携裹价值观冲突而使中欧关系出现波折甚至陷于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衰落的欧洲和贫弱的中国都不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只有携手发展,合作共赢,才能促进双方利益的发展,共同承担责任,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贡献。中国最近提出构建新型国际

²⁵ 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2 年 9 月 21 日第 3 版。

²⁶ 冯仲平:“新形势下欧盟对华政策及中欧关系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2 期,第 1-5 页。

²⁷ “利益置换”是对欧盟过去对华“无条件接触”政策的否定,也就是说今后中国要想从欧盟得到某种利益,必须给予相应的回报,也就是要进行利益交换。参见冯仲平:“新形势下欧盟对华政策及中欧关系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2 期,第 1-5 页。

关系的基本理念，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主张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这是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姿态。中欧之间应积极克服政治互信不足，妥善处理经贸领域的冲突和摩擦，建立管控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实现双方关系的良性发展。尽管中欧关系仍面临不少挑战，但悲观的倾向并不可取，中欧双方应该站在战略的高度，谋取深化中欧关系的前景。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

高祖贵

【摘要】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关系。21 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相互利益需求不断扩展，特别是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能源、安全和地缘战略等利益持续增大，相互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与中亚及西亚（中东）地区的关系大幅推进，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发展中尤为突出。展望未来，中亚、西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区域外力量加大卷入，将影响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 战略关系；伊斯兰世界；中国

【作者简介】 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A Study of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slamic World

By Gao Zugui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a-Islamic World relationship has gained more impetus and entered into the fast track of development due to increasing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strategic interests.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China focuses more on energy and resources, national security in relation to religious extremism, national separatism and terrorism, and changes of regional geo-strategic structures in the Islamic World. Along with increasing mutual interests and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Islamic World (including Central Asia, West Asia,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have been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regards thi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both the Central Asian as well as the West Asian States can be used as examples. During these processes,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ve regimes, such as Shanghai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CO) and Sino-Arab Co-operation Forum (SACF),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uture, the regional challenges in 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rising role of Central Asia, West Asia,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competitors from current great powers, including the U.S.A., Russia, India, Japan and the EU,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Key Words】 Strategic relationship, China, the Islamic World, 21st century

【Autho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nd Professor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CCPS)

随着利益边界的扩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所说的伊斯兰世界在地域上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非这个广阔地带，主要涉及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域。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不断发展主要受两个方面重要因素推动，一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非地区的经贸、能源、资源、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相互需求日益增大，这些区域局势的变化给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发展造成影响；二是美国在反恐战争背景下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发生突出变化，在“再平衡”政策旗帜下对印度洋-亚洲-太平洋板块进行整合，以及由此带动地区重要力量的关系加快重组。在这两方面重要因素的持续作用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新的变化。

一、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利益

中国在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的利益，包括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多个方面。从战略的视角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利益。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三个方面利益的重要性、切实性和紧迫度不断提升，共同推高伊斯兰世界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一）能源利益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始终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在此趋势下，能源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石油消费大幅增加。1993 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6%。随后，石油需求连年攀升，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大。2009 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50%。2011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 60%。2012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56.7%。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 75-80%。总体估算，中国石油进口的 2/3 左右将来自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其中，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仅从中东一个地区进口的石油就不断增多（从 2007 年到 2011 年的数据如下图所示），已经占中国进口石油的 60%左右。与中东相比，由于地理相接以及陆路和管道运输相对便利，中亚能源对中国的吸引力将继续上升。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则由于占据国际能源通道的咽喉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从波斯湾经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

六甲海峡到中国南海的能源通道所运送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70%左右。这条通道显然已经成为中国能源进口的生命线。上述这些石油产区及其运输通道的局势变化，均对中国的石油进口、能源安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自中东国家进口原油量（单位：万吨）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沙特	2633.22	3636.84	4195.31	4463.00	5027.77
伊朗	2053.68	2132.24	2314.72	2131.95	2775.66
伊拉克	144.21	186.01	716.30	1123.83	1377.36
科威特	363.23	589.63	707.58	983.39	954.15
阿曼	1367.99	1458.46	1163.84	1586.83	1815.32
阿联酋	365.09	457.59	330.67	528.51	673.52
也门	323.68	413.22	256.21	402.11	309.81
卡塔尔	28.27	87.78	61.48	56.02	70.70
苏丹	1030.95	1049.92	1219.14	1259.87	1298.93
利比亚	290.58	318.96	634.45	737.33	259.17
阿尔及利亚	161.28	89.76	160.50	175.40	217.23
合计	8759.48	10420.71	11760.21	13448.23	14779.62
全年总量	16317.55	17889.30	20378.89	23931.14	25377.9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转自田春荣：“2011 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12 年第 3 期，第 60-61 页。

（二）安全利益

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关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世界存在的安全威胁向中国境内蔓延渗透；二是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存在在当地遭受威胁。随着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互动持续拓宽加深，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均呈上升之势。在此背景下，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动荡与冲突，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活动发展，以及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均对中国尤其是西部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中，“三股势力”的安全威胁比较突出，涉及的组织包括“东突厥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of Allah）、“东突厥斯坦革命阵线”（Revolutionary Front of Eastern Turkestan）、“东突厥斯坦反对党”（East Turkestan Opposition Party）、“突厥斯坦自由组织”（Organization for Turkestan

Freedom)、“维吾尔人解放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Uighurstan)等。特别是中亚,由于与中国西部在历史、民族、宗教、文化上存在比较密切的关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西部安全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一方面,中亚已经成为“东突”势力的各种组织渗透到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依托基地,“东突”分子从中亚的一些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得到精神支持、物质援助、技术培训等,在遭受打击之后出逃中亚国家藏身。另一方面,美国、欧洲、中东等地的相关组织甚至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通过中亚、西南亚这个地理通道与“东突”相勾结,向中国境内走私毒品、偷运军火和其他从事恐怖活动的物资,遥控中国境内的分裂与恐怖活动。除中亚外,南亚的阿富汗以及中东地区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伊朗等伊斯兰国家的激进主义势力,也利用它们与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的联系,对中国穆斯林聚居区的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施加影响。从中国进入并在阿富汗境内受训的激进分子、同驻阿美军作战的激进分子、被美军俘获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的激进分子,是中国在南亚方向面临的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威胁。从2010年底和2011年初至今,西亚北非地区的大变局使中国在利比亚、埃及等国的利益受损。“东突”等激进势力人员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并参与其所谓的“圣战”,受到暴力和恐怖主义训练之后同样可能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

(三) 地缘战略利益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地理相联。从完整的地区地缘政治视角看,以中亚、西亚(中东)、南亚、东南亚为核心地带的伊斯兰世界构成了中国周边的大半部分。除不接壤的西亚之外,中国与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边界线总长为12000多公里。这个广阔的地带构成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空间的重要部分,既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更是中国向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进一步扩展联系的战略依托。同伊斯兰世界在这个广阔地带上的数十个国家实现和发展良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的基本内容和首要任务。这些国家如果能够保持和平、稳定、繁荣并积极发展对华关系,那不仅将为中国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提供重要保障,而且将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在不断加强的合作中共同实现发展繁荣提供重要动力。如果进一步把中国的周边划分为“东”、“西”两线,中亚-西亚-南亚构成“西线”,东北亚-东南亚构成“东线”,那么“西线”将成为中国应对“东线”挑战和推进与“东线”国家关系的战略依托,中国与“西线”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将同中国与“东线”国家的关系形成互动。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东线”面临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与日本、美国、菲律宾等国的关系存在的变数增多。在此背景下,经营好“西线”对中国处理好“东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乃至塑造积极有利的周边环境,进而在整个

亚洲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二、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保持着以通商和文化交流为主的友好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不断推进，开放对象逐步从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向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展，开放区域从东部沿海向包括中亚、西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西部和西南部区域扩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快速扩展。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整个周边地区的主要国家先后建立不同形式的战略合作关系框架，逐步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各种争端，积极推进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加强多种形式和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大幅提升，中国的海外利益加速扩展，中国对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大幅增强，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上述战略利益日显突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其中，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中亚和中东的关系发展尤为突出，在相当程度上浓缩折射了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变化。

（一）中国与中亚：在地区合作机制支撑下持续强化合作

中国与中亚拥有 2800 多公里的边界线，历史联系悠久。中国汉朝使臣张骞和班超率团访问西域，唐朝开通“丝绸之路”，以及成吉思汗的子孙一度使中亚与中国结为一体，都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苏联解体后，中国很快对中亚新独立的国家予以承认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经贸和人员往来日渐增多。从 1991 年开始，中国先后通过政治外交谈判解决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土争端。1996 年中国倡导创建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组成的“上海五国”机制，就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三股恶势力”等安全问题展开密切合作。2001 年，这个合作机制在其第六次首脑会晤期间增添了乌兹别克斯坦，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并逐步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涵的“上海精神”。

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地区合作机制建设和加强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积极开展多样文明对话等。2002 年 10 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军事演习；2003 年 8 月，中国又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03 年，上海合作组织下属的“反恐中心”在比什凯克宣布成立，该组织的成员国开始就应对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展开更多的实质性合作。2004 年 1 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成立，并正式开始运转。之后，上合组织本身的建设在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得到加强。截至 2012 年底，该组织已经形成四个层次构成的框架：第一个层次是中、俄、哈、吉、塔、乌六个成员国组成的核心圈，第二个层次是由蒙古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四个观察员国组成，第三个层次由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两个对话伙伴国组成，第四个层次由阿富汗、东盟、独联体和土库曼斯坦四个主席国客人组成。而且，该组织已经基本完成机制建设任务，建立起涵盖不同层次、涉及众多领域的比较完善的机构体系以及相应的法律合作体系，合作的领域从起初的安全和政治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扩展深化，已经成为有关各方折冲利益、塑造地区环境的重要平台。2011 年 6 月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峰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阿斯塔纳宣言》，总结了该组织过去 10 年的成长之路。2012 年 6 月北京峰会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明确了该组织未来 10 年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审议批准阿富汗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土耳其成为对话伙伴。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双边与多边相互促进，从起初着重于安全领域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扩展，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原则，进而使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均持续深化。如今，成员国不仅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持续加强机制建设、法律协调、力量投入、能力演练等方面的合作，而且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联互通等方面持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不断取得进展，诸如长达 8000 多公里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并将同中国境内的西气东输二线相连接。2013 年 9 月 3 日到 1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四国并出席在吉尔吉斯比斯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期间，充分阐述了中国有关理念和政策，提议建立上合组织地区银行，提出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C 线建设并尽早启动 D 线建设，实施好阿姆河右岸气田和“复兴”气田开发项目，扩大合作规模。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等国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涵盖政治、安全、能源、金融、经贸、人文等诸多领域。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建议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些倡议和措施将大幅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

（二）中国与中东：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基础上不断加强合作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友好交往同样历史悠久。前述汉朝使臣张骞和班超出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等不仅连接了中亚还穿越抵达了西亚。自 20 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关系一直保持着平等、友好、合作、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基本特征。相互关系的发展，无论是 50 年代的“从陌生到熟悉”和 60 年代的“从起伏到停滞”，还是 70 年代的“从恢复到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外交”，都是如此。中国与中东大多数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诸如科威特（1971）、伊朗（1971）、土耳其（1971）、约旦（1977）、阿曼（1978）、阿联酋（1984）、卡塔尔（1988）、巴林（1989）、沙特（1990）等。90 年代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进口能源需求急剧扩大，中国与中东产油国的关系明显加强。1990 年中国与沙特正式建交，1998 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华；1999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沙特，宣布两国建立“战略石油伙伴关系”，双方定期高层访问随之大幅增加。“9·11”事件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承受着国际社会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对发展对华关系怀有比较强烈的愿望。2002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伊朗、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访土耳其和埃及。同年，摩洛哥国王哈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黎巴嫩首相萨利姆·豪斯、巴林首相萨尔曼哈里发相继访华。2004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埃及等国，再次确认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并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正式宣布成立“中阿合作论坛”（Sino-Arab Co-operation Forum, SACF）及相关工作机制，以加强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2004 年 6 月，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访华，寻求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双方确定准备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同年 9 月 14 日，“中阿合作论坛”在开罗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与阿盟秘书长穆萨共同签署《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两个重要文件。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签署，标志着论坛正式启动并开始运作，以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次会议上，中方提出四点建议：在政治领域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和真诚合作；在投资、贸易、工程承包、劳务输出、能源、交通、通讯、农业、环境保护和信息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经贸关系；扩大文化交流；开展人员培训计划。双方相信论坛将为中阿之间增进多边对话与合作提供新的途径，表示将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在经济、贸易、投资、文化、大众传媒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合作以促进共同进步。此次会议还决定于 2006 年在北京举行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中阿合作论坛已经形成部长级会议、高官会、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专题国际研讨会、阿拉伯—中国对话研讨会、企业家大会、商务合作研讨会、环境合作

会议等构成的会议磋商体系。之后，中阿合作论坛 2006 年在北京举行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决定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并签署四个合作文件，双方同意推动建立政治磋商、能源、人力资源开发和环保等领域的合作机制；2008 年在巴林举行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着重探讨加强可持续发展和投资合作；2010 年在天津举行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决定在论坛框架下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并签署《关于中阿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宣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公报》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10 年至 2012 年行动执行计划》；2012 年在突尼斯举行了第五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形成了友好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在经济上，能源合作和经贸合作不断推进，2011 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 1900 亿美元；在安全上，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这加上中国与伊朗在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历经曲折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公正立场，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自 1992 年建交以来经济合作、人文教育交流等方面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与整个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日显全面，并持续深化。

2010 年底和 2011 年初以来中东大变局的发展，给中国与西亚（中东）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造成了挑战。

三、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前景：一个简短结论

随着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相互利益需求不断扩展，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日益频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正在迎来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自身正在发生的突出变化将影响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目前，中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尚未完成；西亚（中东）大变局正处于最艰难的阶段并可能再度经受剧烈动荡；南亚将围绕阿富汗在美国和北约撤军之后的动荡和重建发生重组；东盟在加速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引入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欧盟等多个战略因素而使地区局势走向增加变数。这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都将直接影响中亚、西亚（中东）、南亚、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关系的前景。

另一方面是区域外战略力量的卷入将影响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亚的战略角逐迫使中亚国家在俄美中之间寻求平衡，既促使中亚国家有更大的动力推进对华关系，也对其发展对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制约。西亚（中东）地区局势走向充

满不确定性，美俄围绕叙利亚危机的折冲博弈继续演化，美俄英法中德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合作与竞争交织发展，美欧俄围绕埃及局势走向的博弈继续发展，这些事态的发展都将影响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美国和北约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围绕阿富汗重建走向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博弈和关系调整，将使中国在阿富汗乃至整个南亚地区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美日欧印等持续加强对东盟地区的战略部署，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个轨道持续深化对东盟国家的关系，这同样增加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总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将在发扬历史上友好互利关系的传统要素同时，基于相互日益扩大的利益需求，面对当前和未来相互关系的新态势，不断发现、确认、培育、扩大相互关系的价值和意义，在应对各种新情况和新挑战的过程中推进相互关系发展。

多边视角下的中俄经贸关系及发展前景

高飞 张建

【摘要】 经贸关系一直被视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短板。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两国国内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制约,仅从双边角度寻找突破是不够的。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中俄经贸关系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拟从多边的视角研究化解中俄经贸关系中现存问题的方法,探究未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途径。

【关键词】 中俄关系; 中俄经贸关系; 多边平台

【作者简介】 高飞, 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建, 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北京, 100037

The Prospect of Sino-R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ateralism

By Gao Fei and Zhang Jian

【Abstract】 Economy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considered a weak component in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Sino-Russian economy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not only restrict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ystemic transition, respectively, but also influenced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ity.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ino-Russian economy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seek solutions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hrough a multilate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Sino-Russian economy and trade relations, multilateral platform

【Author】 Gao Fei, Professor a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CFAU); Zhang Ji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CFAU.

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稳固发展。两国彻底解决了存在 300 多年的边界问题,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中俄两国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中俄政治关系的发展已成为冷战

后大国之间关系的典范。相比政治关系，中俄经贸关系一直被视为两国关系中的短板。中俄两国幅员辽阔，经济互补性强，彼此交往历史悠久，并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发展中俄关系有着很强的内生动力，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¹然而，从外部来看，中俄双边贸易受外部影响也相当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中俄双边贸易连续两年下滑。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俄贸易额大幅下滑31.8%。客观而言，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两国国内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制约，仅从双边角度寻找突破是不够的。鉴此本文将分析当前中俄经贸关系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多边的视角探究未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途径。

一、中俄经贸发展的主要成就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首先，双边贸易迅速发展，金融合作不断深入。1991年中国对前苏联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04亿美元，而1992年中俄贸易总额达58.6亿美元，2012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81.6亿美元（见下图）。²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11月中俄最高领导人会晤共同商定到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000亿美元，到2020年提高到2000亿美元。在金融合作领域，打造“强势卢布”是俄罗斯实施强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中国未来改革的重要目标，中俄两国在金融合作方面合作潜力巨大。2002年，中俄两国央行共同签署《关于边境地区银行间贸易结算协议》，开办了本币结算业务。2005年1月1日中俄边境贸易正式启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俄两国加快了金融合作的步伐。2008年10月举行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签署了一系列金融领域的合作协议，包括俄罗斯银行在香港上市，将中俄金融合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10年11月，中俄两国总理会晤签署了1992年《中俄政府间经贸关系协定》的补充议定书，

本文为国家社科课题《未来十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2BGJ014)阶段成果。

¹ 王树春：《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陆南泉：《中俄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版；Richard Lotspeich,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Post-Soviet Era”, Edited by James Bellacqua,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10; Ryzhova, “Trans-border Exchang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 Case of Blagoveshchensk and Heihe”, Grigory Ioff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В.В.Карлу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ом поле Евразии*,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2г; Рогачев И.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це XX-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Известия, 2005г.

² 海关总署网站，2012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4602/module108994/info412938.htm>, 上网时间：2013年1月14日。

规定双边贸易支付和结算既可使用可自由兑换货币，也可以使用两国本币，为中俄本币结算扩大到两国一般贸易创造了条件。同年 11 月 22 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了人民币和卢布挂牌交易，俄方也于 12 月 16 日在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开展两国本币业务，极大地便利了双边贸易往来。2011 年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金融合作分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关于结算和支付的协定》，2012 年 12 月中俄总理第十六次会晤签署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储蓄银行金融合作协议》。金融合作已经成为近年来中俄总理会晤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第二，科技合作发展迅速。科技合作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重要领域。2004 年 10 月普京总统就强调“将来俄中之间的经济联系将首先在高科技领域实现”。³2005 年 6 月 21 日，胡锦涛主席在访俄前也指出：“要积极推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质量和水平。同时要积极推动科技人才交流，促进两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2012 年普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新天地》文章，表示“要通过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来优化双边贸易结构”，“我们还要讨论两国成立真正的科技联盟，包括建立连接两国企业、科学、设计和工程中心的生产与创新链，共同开发其他国家的市场等等”。⁴ 根据国际贸易的经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通过技术扩散实现产品出口的升级，大约在人均 GDP 一万美元（1995 年，PPP）

³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人民献上最美好的祝福》，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 11 日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华小记者杂志》的联合采访，参见《人民日报》，2004 年 10 月 13 日。

⁴ 普京：“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新天地”，《人民日报》，2012 年 6 月 5 日。

左右，其技术创新对出口的影响开始显现。⁵根据 IMF 数据，2011 年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俄罗斯人均 GDP 是 10437 美元。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科技和产品创新，出口种类更多的商品仍将是俄罗斯出口增长的重要方式。这无疑将有助于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近年来，中俄科技合作增长迅速，一定程度佐证了这一趋势：从 2006 年开始，中国开始引进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用技术，2006 年，中国引进 38 项，价值 1348 万美元；2007 年引进 31 项，价值 3329 万美元；2008 年引进 31 项，涉及金额 3080 万美元；2009 年引进 32 项，价值 7256 万美元；2010 年引进 31 项，价值 17.5 亿美元，这些民用技术主要集中在核电、电子、航天、航空等领域。⁶

第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合作不断深入，双边经贸合作向战略层面发展。交通设施得到了改善——黑河至哈尔滨的铁路线、珲春至卡梅绍瓦亚的铁路已修通，中俄首条跨越黑龙江的 500 千伏直流联网输电项目已经完工。俄联邦政府还宣布，2013 年计划投资 7.12 亿卢布（约合 2334 万美元），用于与中国临界的俄外贝加尔边疆区道路建设与维护，其中包括赤塔市—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公路的维修、维护工程。⁷这一切使中俄发展边境经贸合作的交通设施得到了根本改善，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贸的利润最大化，为未来中俄自由贸易区建立创造了条件。此外，能源合作也是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亮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不断扩大。俄罗斯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出口国，能源合作有益于改善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进出口战略布局，同时也有益于世界能源供求关系的基本稳定。1997-2008 年期间，中国石油需求增长占到了世界需求增长的 1/3；与此同时，俄罗斯一国石油供应的增幅就达到了世界石油供应增长的 40%⁸。从 2006 年起，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出口石油 1500 万吨。2011 年 1 月 1 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启用，中俄能源战略合作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第四，中俄经贸合作机制日益完善。良好的政治关系正在逐步转化为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保障。中俄元首定期会晤机制是两国经贸合作中的特有机制，其宗旨是就中俄经贸合作的项目、进展和问题交换意见。1996 年，为推动和扩大中俄在各个领域的经济贸易合作，两国政府确立了总理定期会晤机制。1997 年第二次总理会晤期间，中俄签署了《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在中俄总理会晤委员会框架内，成立了经贸

⁵ 参见田丰：“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俄罗斯”，《中国远洋航务》，2012 年 5 月刊，第 37-39 页。

⁶ 数据来自《中国海关年鉴》2006-2011 年卷，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部分，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⁷ 2013 年，俄政府加大对俄连接中国的公路维护投入，商务部网站 http://www.crc.mofcom.gov.cn/article/shangbiandongtai/201301/84978_1.html，上网时间：2013 年 1 月 20 日。

⁸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8,2009,2010. www.bp.com, 上网时间 2013 年 1 月 25 日。

合作分委会（正部级），协调双方的各项政策。目前该委员会下设经贸、能源、运输、核能、科技、航天、银行和信息等 8 个分委会（5 个正部级，3 个副部级），各分委会下还设立了 10 多个涉及主要合作领域的行业间分委会以及设有相关的常设工作小组。中俄经贸分委会下设边境地方经贸、林业、质检和投资合作 4 个常设工作小组。此后，又陆续成立了民航与民航制造业合作、环保合作两个分委会。如今，中俄之间这种高层领导的定期会晤机制已经逐步制度化，为中俄经济合作架起了一道制度的桥梁。

二、中俄经贸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深入发展中俄经贸合作俄罗斯存在“心态失衡问题”，影响双边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中俄地缘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 100 多年来双边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俄方部分人士心态失衡，夸大了双边贸易结构的问题，阻碍了中俄间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展。在过去的 15 年时间里，俄罗斯对华出口主要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中国对俄出口主要以轻工业制品、科技产品为主。俄罗斯政府多次提出需要努力多元化出口产品，增加高科技工业制成品出口。然而，出口构成的现实却走向反面。能源和原材料在俄对华出口中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 10% 提高到了 2010 年约占 70%；与此同时，机械和交通工具在对华出口中迅速下滑至 2010 年只占 1%。全部的精加工产品对华出口所占比例低于 10%。⁹2009 年中俄正式批准的《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其中包括 205 个两国边境地区的重点合作项目，但是这一文件中的合作项目在俄方部分人士看来是中国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获取原材料的手段，¹⁰项目实施因此进展较慢。武器出口可以反映俄罗斯高技术出口情况，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报告显示，俄罗斯对华武器出口在 2005 年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2010 年仅及最高水平的 13%。同时，中国进口占俄罗斯武器出口的比重也从超过 60% 下降到不足 7%。¹¹对华武器出口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自身军事装备水平的进步，同时也

⁹ Arkady Moshes & Matti Nojonen (eds.), *Russia-China Relations: Current State, Alternative Fu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9, 2011, p43-45.

¹⁰ Китай забирает Сибирь, <http://voprosik.net/kitaj-zabiraet-sibir/>, 上网时间：2013 年 8 月 17 日。

¹¹ Arkady Moshes & Matti Nojonen (eds.), *Russia-China Relations: Current State, Alternative Fu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9, 2011, p43-45.

要归因于俄罗斯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将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出售给中国。在相互投资领域，问题同样十分明显，根据俄罗斯的统计，2010 年俄罗斯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520 亿美元，而只有 3 亿来自中国，同期俄罗斯企业对外投资达 410 亿美元，投向中国的只有 2000 万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也表明，在中国 FDI 流入和流出中，俄罗斯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¹²中俄之间低水平的相互投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转型经济的共同特点，中俄两国企业投资与引资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对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兴趣受阻于俄罗斯的高工资和相对较低的生产率。据专家预测，近年俄罗斯经济活动中劳动力缺口达到 500 万到 700 万¹³，甚至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的投资需要中国工人参与，但俄罗斯对移民问题的担心使这一合作难以实现。在资本密集型领域，俄罗斯并不欢迎小规模的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者尤其如此。¹⁴在能源领域，外国公司受到重重阻碍。事实上，俄罗斯政府并不允许中国国有公司获得俄罗斯能源部门的主要资产。¹⁵从 2002 年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失败以来，中国公司在俄能源领域的收购行动一直受到俄方政治上的阻挠，每次都在最后一刻功败垂成，中国能源企业在俄投资成功的个案寥寥无几。尽管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申请在俄罗斯建立生产厂，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小规模的中国汽车得以在俄罗斯组装，俄罗斯国内汽车制造商千方百计说服决策者阻止中国汽车进入俄罗斯。重大工程项目同样受到影响，中俄输油管道项目从 1994 年到 2010 年，俄方政策多次反复，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才得以解决。连接黑河和布拉格维申斯克横跨黑龙江的大桥，中方部分已经完工，俄方却仍然悄无声息。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俄罗斯一些利益集团对与中国开展深层次合作持有一定戒心，担心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会被逐渐“中国化”¹⁶。

第二，影响中俄贸易的关键因素是贸易环境不规范。

贸易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投资经营环境、贸易秩序和服务环境。从双边政策环境看，中国的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较为稳定，而俄罗斯经济形势不稳定，鼓励投资的政策经常变化，给中国企业和经商人员带来较大困惑。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俄罗斯在 185 个国

¹² 参见《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78 页。

¹³ 于小琴：“试析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0 年第 11 期，第 12-19 页。

¹⁴ 俄罗斯投资所占 GDP 的比重只有 20% 左右，远低于新兴市场 30-40% 的比重，俄罗斯国内公司进行的投资也不大。

¹⁵ Arkady Moshes & Matti Nojonen (eds.), *Russia-China Relations: Current State, Alternative Fu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9, 2011, p43-45.

¹⁶ Надо ли России бояться Китая?,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ззубцев-Кондаков, Илья Дроканов, Питер, 2011 г.

家和地区中排名世界第 112 位。¹⁷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在很多领域的投资有明显的限制¹⁸。俄罗斯国家杜马明确界定了“战略部门”，并对外国投资者在采矿、航空、核电和媒体行业加以限制。¹⁹从投资经营环境看，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的经营环境受俄罗斯国内的社会治安秩序影响很大。普京总统执政后，俄罗斯社会秩序虽趋于好转，但社会治安仍是外国投资者关注的重要投资风险。此外，俄罗斯在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并未形成有效的资本市场，融资成本较高，开拓当地市场风险较大。从贸易秩序和服务环境看，“灰色清关”是非规范贸易的典型表现，长期困扰中俄贸易。“灰色清关”的形成既有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又有俄罗斯海关制度和边检制度严苛却效率低下的现实原因，加上商品以“灰色清关”方式进入俄罗斯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2004 年俄罗斯关闭“艾米拉”市场事件和 2009 年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都与“灰色清关”直接相关，给中国商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外，两国银行直接结算规模不大，保险、信贷领域合作水平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俄双边经贸的健康发展。造成贸易环境方面问题的原因和中俄经济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有关，但主要是因为在俄经贸活动缺乏可以预见的、透明的贸易环境，缺乏清晰的规则，没有解决经贸纠纷的通畅渠道。

第三，中俄在第三国存在经济利益竞争，有待加强协调。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传统上扮演中心角色，近年来俄试图通过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等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俄还希望成为地区金融中心，努力强化卢布的地位，以使卢布成为地区的主要货币。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在中亚影响的持续提高，无疑增加了中俄之间的竞争。中国强大的金融实力使其在能源项目竞争中比俄罗斯和其他竞争者拥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担心中国正在逐渐将俄罗斯挤出中亚的报道在俄罗斯时而仍见诸于报端²⁰。2009 年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获得了哈萨克斯坦能源公司 MMG 的控股权，全部交易包括中国向哈萨克斯坦提供 100 亿美元的信贷。此前，俄罗斯和印度能源公司都试图取得 MMG 的控股权。²¹尽管俄罗斯公司依然在哈萨克斯坦经济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中国公司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对外出口比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 1/3 下降到约 10%。与此

¹⁷ Не бойтес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дракона, Евгений Бажанов, http://www.ng.ru/ideas/2013-08-02/9_china.html, 上网时间: 2013 年 8 月 5 日。

¹⁸ Kari Liuheto, “A future role of foreign firms in Russia’s Strategic industries”,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Pan-European Institute, 4 (2007), <http://www.tse.fi/pei/pub/>, 上网时间: 2013 年 1 月 24 日。

¹⁹ Libor Krkoska and Yevgenia Korniyenko, “China’s Investments into Russia: Where do they go and how Important are they?”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ume 6, No.1 (2008), P42.

²⁰ Не бойтес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дракона, Евгений Бажанов, http://www.ng.ru/ideas/2013-08-02/9_china.html, 上网时间: 2013 年 8 月 5 日。

²¹ 参见, BOFIT Weekly. 21/2009, http://www.suomenpankki.fi/bofit_en/, 上网时间 2013 年 2 月 5 日。

同时，中国所占的比重增长了一倍，达到约 15%。俄罗斯占据哈萨克斯坦进口市场的 1/3，相比之下，中国所占的份额从 2%迅速增加到 1/4，清楚反映了中国经济影响的提升。²²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于 2009 年 12 月完工，这将无疑增加中国市场在土库曼斯坦对外出口中的份额。而在同一时期，由于 2009 年春季土俄天然气管道的爆炸，双边贸易呈直线下降。在土库曼斯坦的进口构成中，中国已经取得了同俄罗斯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弱化了俄罗斯在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谈判中的地位。中国积极主张中亚地区开放市场，开放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也使中亚国家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但客观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俄罗斯对此并非无动于衷，2011 年 7 月，俄、白、哈“关税同盟”启动后，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贸易立即下降了 31.3%（同比前一年同一时期）。²³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俄罗斯于 2010 年提出了“东向战略”。²⁴俄罗斯积极参加亚太地区事务，包括在印度、越南等国推销俄制武器，而这客观上加剧了中国的安全风险。2012 年当选总统后，普京撰文坦诚指出，“俄中两国在第三国的商业利益并不总是一致”。²⁵如何合理竞争，加强协调是中俄经贸关系面临的又一考验。

总的来看，中俄经贸关系中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有着深层的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中俄经济转型、中俄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结果。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化解现实难题，需从多边平台寻找思路。

三、利用多边平台化解中俄经贸难题

多边外交意味着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磋商、协调及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讨论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多边主义发展迅速，推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制度化建设。在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中多边是重要的舞台，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发展多边外交，支持联合国、20 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

²² Arkady Moshes & Matti Nojonen (eds.), *Russia-China Relations: Current State, Alternative Fu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49.

²³ 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鲁木齐海关网站，2011 年 6 月外贸进出口商品产销国别表，<http://urumq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66/tab5520/module15998/info309734.htm>，上网时间：2013 年 8 月 19 日。

²⁴ Going East: 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Going-East-Russias-Asia-Pacific-Strategy-15081>，上网时间：2013 年 2 月 1 日。

²⁵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http://www.putin2012.ru/#article-7>，上网时间：2013 年 1 月 4 日。

发挥积极作用。²⁶近年来，中俄两国频繁利用国际、地区多边机制，加强双边协调和交流，多边平台已经成为化解中俄经贸难题的新途径。

通过 20 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可以解决中俄关系结构性变化导致的心态失衡问题；WTO 等多边组织、多边平台有助于解决贸易环境规范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可以通过多边协调，促进相互投资，合理经济布局，化解中俄在第三国的竞争。

第一，通过多边经济平台“调整心态”，建立和加强相互了解、合作共赢的观念。

广阔视野有助于俄罗斯化解观念上的误区。中俄经贸关系中的问题既是俄罗斯自身的产品结构决定的，也是当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通过 20 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俄罗斯更加容易认识自己的贸易结构问题的实质。俄罗斯是资源性经济，资源行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1/3 以上，能源出口占整个出口的 60%以上，全部初级产品则占 80%左右。俄罗斯对欧盟能源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 80%以上，其中石油主要向德国、英国、波兰及中国出口，天然气主要输往乌克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²⁷俄罗斯的出口商品结构以能源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为主，尤其是俄罗斯的石油，受国际石油价格影响较大。国际油价上升，俄罗斯的出口额就会上升，国际石油价格下降，俄罗斯的出口额就会减少。因而，从多边角度看中俄经贸结构不合理责任不在中国，俄罗斯和所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结构都存在类似问题。从国际经济秩序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和机制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未能充分反映当代世界的实力消长，也造成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定位模糊，贸易摩擦增加。据汇丰银行 2012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六成的中国内地外贸企业表示未来五年内有意与金砖国家进行贸易，其中俄罗斯和巴西最受青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俄罗斯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²⁸中俄发展经贸合作不仅有政治基础，也不乏情感支持。在发展过程中，作为转型国家，中俄面临的问题是共通的，需要通过多边合作寻找问题根源，把握自身定位，建立相互信任。因此，2012 年 3 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共同表示要推动金砖国家加强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对外发出团结、信心、共赢的信号，这表明双方已经认识到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经济秩序的重要性。

第二，利用多边机制改善贸易环境，加强国际协调。

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解决成员方贸易争端的重要渠道。中国和俄罗斯分

²⁶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8 页。

²⁷ 林跃勤主编，《俄罗斯经济数字地图：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一版，第 151 页。

²⁸ 中国经济网，汇丰中国报告称：内地六成外贸企业钟情金砖国家，

http://www.ce.cn/macro/more/201202/24/t20120224_23102690.shtml，上网时间：2013 年 1 月 30 日。

别于 2001 年和 2012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为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可以有效改善贸易环境,维护两国贸易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俄罗斯长期游离于世界贸易规则、体系之外,却又是资源、能源的大国。尽管能源和资源是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影响很小的产业部门,但是俄罗斯融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入世前平均关税为 11%,高于发达国家平均关税 5%,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 10%以下。”²⁹加入 WTO 之后,根据入世协议,俄罗斯会对总量超过三分之一的进出口税目执行新的关税要求,总体关税将降低 2.2%。³⁰从俄罗斯自身改革的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加入 WTO 有利于加快俄罗斯国内的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步伐,调整与全球化和 WTO 不适应的贸易政策,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在改善贸易环境、贸易秩序上向前迈进一大步。当前制约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政策环境、投资经营环境、贸易秩序和服务环境,也将随之改善,“灰色清关”等现象将会加速消失。俄罗斯关税调整、经济环境的改善将会给中俄贸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正如俄罗斯入世首席谈判代表梅德韦德科夫所说:“中俄贸易发展的潜力巨大,我们是好邻居、好伙伴。俄罗斯成为 WTO 成员之后,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经贸的往来也将提供更多更广的机会”。³¹

第三,利用多边平台化解利益矛盾,实现互利共赢。

多边平台有利于化解中俄在第三国(地区)存在的利益竞争问题,中俄经济利益矛盾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发展成员国之间有效的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之一,通过上合组织这个多边平台发展地区经济合作具有众多有利条件——地缘政治上的紧密联系;经济上较强的互补性;“丝绸之路”留下的友好历史记忆;克服全球经济危机的客观要求;中俄对促进经济合作的良好愿望,等等。目前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俄罗斯希望垄断中亚的能源输出,中国希望中亚能源输出多元化;二是中俄对于中亚地区市场份额的竞争。利益上的竞争并非战略上的根本矛盾。根据英国 BP 公司发布的 2012 年世界能源统计报告,截至 2011 年末俄罗斯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4460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储量的 21.4%。³²俄罗斯还是世界第一大原油生产国,已探明储量为 882 亿桶,占世界储量的

²⁹ Проблемы вступ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ВТО,<http://www.Referat.ru/referats/view/30404>,上网时间:2013 年 1 月 7 日。

³⁰ 王宗英,俄罗斯 22 日正式加入 WTO,<http://finance.eastday.com/economic/m1/20120822/u1a6802692.html>,上网时间:2013 年 1 月 11 日。

³¹ 王宗英,俄罗斯 22 日正式加入 WTO,<http://finance.eastday.com/economic/m1/20120822/u1a6802692.html>,上网时间:2013 年 1 月 13 日。

³²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2,<http://www.bp.com/sectionbodycopy.do?categoryId=7500&contentId=7068481>,上网时间:2012 年 12 月 20 日。

5.3%。³³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中国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使中国获得了稳定的能源供应，也满足了俄罗斯发展“东西方平衡的能源战略”的需要。能源合作对中俄双方来说是买家和卖家互利共赢的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2007年11月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议商定每年将通过中哈石油管道向中国供油500万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其多元化出口战略。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对于中俄两国来说，最大的成就在于促进了中亚地区的融合。如亚洲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沙亚赫梅托夫所说：“事实上，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与邻国借此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机会。”³⁴2009年初中国以“贷款换石油”向俄罗斯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换取未来20年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石油管道每年1500万吨的稳定石油供应，今年6月中俄双方再次签署协议，俄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在25年内对华供应约3.65亿吨原油，总金额约达2700亿美元³⁵。上合组织正在把地缘的接近转化为区域合作的优势，促进了成员国间的良性互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在中国西部的投资提供了机会，中亚经济的成长也促进了中国新疆等地方贸易的发展。对于在中亚地区的利益矛盾，中俄双方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化解分歧。未来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组建，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的发展，以及渐进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将参照国际经验，为解决中俄在地区的经济利益矛盾提供方案，在2013年9月的比什凯克上合峰会上，中俄已确定将会采取措施，继续推动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³⁶。此外，在亚太地区，中俄之间的协调也在增强。2012年9月，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与会各方提议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决定签署一项包括54项环境产品在内的清单，同意到2015年把清单上的产品关税降至5%或5%以下，这都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积极响应。通过多边平台中俄之间经贸关系的良性互动在不断发展，正如普京在《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中说的那样：相信中国经济增长绝不是威胁，要抓住中国发展的“东风”，中俄两国应该更加积极的建立合作关系，结合两国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将中国的潜力用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崛起。³⁷

总的来看，中俄经贸出现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正如李克强访问俄罗斯时与普京会

³³ 国家能源局网站.俄罗斯石油储量占世界5.3%，http://www.nea.gov.cn/2012-06/20/c_131664484.htm，上网时间：2013年1月13日。

³⁴ 新华网，胡锦涛出席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通气仪式，www.xinhua.com，上网时间：2009年12月14日。

³⁵ 胥文琦，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对华供应原油协议，<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6/4051963.html>，上网时间：2013年6月28日。

³⁶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кануне саммита в Бишкеке: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 момента, Кирилл Бар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Май 2013г.

³⁷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http://www.putin2012.ru/#article-7> 上网时间：2013年1月4日。

晤时指出的那样，“中俄共同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像涅瓦大街一样平坦’，一路上也会遇到困难，但相信，中俄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总是能够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³⁸利用多边平台，建设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机制，对于解决中俄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是一种理念创新，能使中俄之间更好地了解自身、了解对方，像亲密朋友那样去解决问题，使双边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³⁸ 网易财经网，2012年4月李克强访俄与普京会晤时的讲话，
<http://money.163.com/12/0610/23/83M3QRAL00253B0H.html>，上网时间：2013年1月30日。

亚太秩序转化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方向

钟飞腾

【摘要】 本文旨在讨论未来十年亚太国际秩序调整的动力和演进方向。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秩序发生过三轮大的调整，第一轮调整是美苏战略失衡引发推动中国与美日同盟关系的和解，是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再平衡；第二轮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日本在经济上挑战美国主导地位，是一种基于共同安全框架的经济调整；最近这一轮亚太地区秩序的调整直接起因于中国崛起，有可能改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一方面，此次秩序的调整是在和平发展成为全球秩序转换动力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难以用战争手段解决权势转移问题；另一方面，这一轮调整是在前两次的基礎上发生的，结合了地缘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国际社会普遍以中美力量对比来推导未来的地区秩序，认为出现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两个亚洲”，但这一说法更多是对未来的推测，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中美尽管对未来亚太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但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希望看到一种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地区秩序。

【关键词】 地区秩序；亚太；两个亚洲；中美关系；开放性地区主义；功能性合作

【作者简介】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Order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By Zhong Feite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dynamics and evolutionary wa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 In general, there have been three waves of regional order change since the 1970s. The first kind of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was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Japan alliance, which was a geopolitical arrangement driven by the strategic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second one took place in the late 1980s with the rise of Japanese economic pow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Japan to

upgrade the U.S.A.-Japan alliance without any great change in the regional order. The most recent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initially emerged due to the quick and continuous rise of China. Due to the great scale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rise of China,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might change the global order in the near fu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third wave of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is driven by peaceful dynamics, and the current American hegemony cannot contain China's rise through military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regional order is direct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its two predecessors and tries to combine geopolitical balance with geo-economics. Focusing on the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many believe that regional order has disintegrated into "two Asias", with China domin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ing security order. However, this kind of judgment is not a reality but merely speculation. Althoug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ertainly play the greatest roles in future regional order formation, other regional countries still have their positions in the new regional order. The ideal regional order model in their minds is a much more balanced and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not a conflictual and divided one. Moreover, an open regionalism may help them to play a functional role in regional order.

【Key Words】 Regional order, Asia-Pacific region, two Asias, Sino-U.S.A. relationship, open regionalism,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uthor】 Zhong Feite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国际秩序从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议题。这不仅是因为特定的国际秩序代表着稳定的权力格局和规范国家间行为的规则，也因为秩序一经生成就将延续一段时期，对处于体系之内的国家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在亚太地区，历经数次较大的地区性秩序变革，地区内的国家各有不同的反应和命运，中国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和新中国的诞生，但目前依然处于海峡两岸不统一的状态；日本从成功融入西方到二战战败，在战后又重新崛起为经济强国；朝鲜半岛在经历被殖民、亡国之后，最终分裂为两个国家，迄今也没有签署国家间和平条约；东南亚的国家也经历了被殖民，在二战结束后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到现在走向一个东南亚联盟的进程中。

在这些秩序的转变中，多数时候地区性国际秩序被更大范围、更大动能的全球性秩序所影响和控制，而亚太地区秩序很少具有推动全球性国际秩序变革的动能。不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引发的大量讨论表明，亚太国际秩序有可能成为推动未来全球秩序变化的根本动力。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崛起显然将极大改变地区秩序，但无论是从经济力量对比，还是对规则的创新而言，中国都不可能是地区秩序的主导者。

一、全球性秩序转变的动力从体系性战争转向和平

在从朝贡秩序转向帝国主义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对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有着深切地体验。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为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推广者，且以武力作为主要手段。而对于朝贡秩序的缔造者中国而言，武力并不是理解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关键。但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更具战争能力，以欧洲为基础的西方权力迅速瓦解了全球其他地区的旧势力，推动了全球体系的形成，中国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秩序的安排，并从中学习秩序的内容。中国学习西方秩序最大的一次成功是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顶住了美国的打击。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通过共产党完成了中国文明的再造，武力重新成为中国获得国际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历史上通过体系性战争转变秩序不同，人类历史最近的一次全球性国际秩序转变是通过一个大国的和平解体而完成的。从经验层面看，人们逐渐接受战争或者武力并不是改变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从理论层面看，国际秩序的转变可以不是体系层面、而是经由单元层面的变化而获得。因此，与历史上的秩序转变相比，冷战格局的解体不是以某一集团中几个国家的失败，而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力量迅速丧失为特征。这意味着，单元层面的因素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取得冷战的胜利，全球秩序的整体性以及结构性比以往更为强大，美国这个单元主导了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当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体系中。苏联解体前后，按照名义 GDP 衡量，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 6.5%，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 10.8%。¹鉴于美国和日本是同盟，如果以“联盟经济”的视角看待中国所处的体系性力量，即以北美、西欧、澳新以及日本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中国显得更为弱小。在经济权力格局对比上，中国不存在平衡该体系的实力。中国只能是体系的参与者，也是体系规则的接受者。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至少在亚太地区不存在一个足以挑战美国体系的国家，即单元层面上没有出现足以改变美国权势的平衡者。

由于美国一家独大，美国的战略总体上是维持霸主地位。从目前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依然处于“一超”位置。从理论上讲，一个单一的霸权主导国际体系时，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如果抛开感情色彩，中国主导的朝贡秩序也是一个实力对比悬殊的地区秩序，总体上也是稳定的。另外，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军费开支占全球 GDP 的比重看，其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该比重已从 1988 年的 0.89% 下降至 2012 年

¹ 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2 年，中国名义 GDP4226 亿美元，美国 62618 亿美元，日本 38528 亿美元；1991 年，中国名义 GDP3795 亿美元，美国 59307 亿美元，日本 35368 亿美元。正文中数据是两年平均，数据来源于 www.dataworldbank.org。

的 0.24%。²这意味着，全球总产出中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运用于非军事领域。从安全保障环境的巩固有利于推动经济交易而言，这个 0.65%的缩减功劳很大。

二、中国崛起之前的两次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2010 年中国名义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崛起”成了亚太秩序转变最主要的动力，至少在单元层面上看是这样的。在此之前，亚太地区有两次比较明显的地区秩序调整，分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所引发的地区秩序变革，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美日关系调整带动的秩序调整。历史经验表明，挑战者以单元的姿态面对整个霸权体系的压力时，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有益的国际战略环境。

20 世纪 70 年代初，面对苏联的进攻，国力略有衰落的美国以均势作为原则，形成了“联华抗苏”大战略，由此牵动亚太国际秩序的大调整。1971 年，澳大利亚籍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亚洲与太平洋的新均势》一文中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亚太秩序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中苏集团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对抗，发展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进入 70 年代，美国联盟体系的影响力衰退，地区秩序进入了一个相对自助的阶段。³布尔之所以说美国联盟体系影响衰退，除了中国因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经济崛起。日本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再度提出“太平洋世纪”、“亚太世纪”等构想。⁴从体系层面的权力对比看，在这一轮秩序变动中，经济层面变化的主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⁵，但在地缘政治上，中国从中苏同盟转化为美国的准盟友，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在经济融入大战略，确实是很大的变革。因此，美国主动发起这次秩序调整，综合考虑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仅打击了苏联，某种程度上也帮助美国牵制了日本。比如，以钓鱼岛问题来看，美国当时的策略是两边讨巧，对中国说“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对日本则说将“行政权”归还。⁶显然，在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时，中国和日本都容忍

² 根据该研究所(SIPRI)网上数据库提供的军费开支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 GDP 数据计算所得。

³ Hedley Bull,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 49, No.4, 1971, pp 669-681.

⁴ Pekka Korhonen, "The Pacific Age in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7, No. 1, 1996, pp. 41-70.

⁵ 1967 年，日本的 GNP 是中国的将近 3 倍，是地区内排名第 3 的印度尼西亚的 15 倍。参见，Donald C. Hellmann, "The Emergence of a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ub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4, 1969. p.247.

⁶ Kimie Hara, "50 years from San Francisco: Re-examining the Peace Treaty and Japan's Territorial Problems," *Pacific Affair*, Fall 2001, pp.377-379.

了美国的这种战略。在美国构建的体系中，中国、日本的经济实力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也是中日长期接受美国安排的重要原因。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经济秩序的变换上有潜在能力与美国竞争的是日本，日本的经济总量接近于美国的 61%。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精英总体上倾向于做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而不是“挑战者”。尽管如此，日本凭借其卓越的经济能力要求形成以“日美欧”为核心的新领导体制。冷战结束前夕，日本外务省次官栗山尚一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衡量准则，即以 1921 年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美英日海军舰只总吨位 5：5：3 的比例，确定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三极共治”中日本的比例地位。⁷对美国来说，战胜了苏联证明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几代人奋斗四十年才成就的霸权基业，不能让日本分享这一荣耀。因此，在美日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因素再度成为美国平衡日本势力的考虑。1995 年，美国出台新东亚战略报告。该战略不仅让日本再度确认美日同盟，也让中国继续沿着市场经济体系前进，可以说“奈报告”捍卫了美国在东亚确立的秩序。⁸十几年以后，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挑战却越来越引起美国的重视，结果当年被设计用来对付日本的东亚战略，如今被解释为引导中国走向成功。当年的设计者，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向中国人回忆这一战略时，命名为“融入+对冲”，说是成功地综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因素，既防止中国打“日本牌”，也促使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经济体系。⁹约瑟夫·奈没有告诉中国人的是，当年的这项战略主要是为了说服日本人和美国的反对派接受美日同盟，中国在这项战略中是个配角。

亚太国际秩序的这两轮调整，对理解未来中国崛起对秩序的影响力有不少启发之处。第一，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在美国体系内扩大自身的实力尚不足以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第二，经济实力的增长会改变美国体系对一个地区的看法，如果美国不能使得该地区的收益增强美国体系的实力，美国倾向于削弱它。这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开抵制日本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判断美国是否继续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美国从中所获得分配性利益是否继续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态势演进。

第三，没有政治影响力作为支撑的地区经济增长很容易招致弱化。日本曾长期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关键在于日本通过美国体系获得“假性领导力”，即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⁷ 栗山的文章发表在《外交论坛》1990 年 5 月号，关于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对新国际秩序的探讨参考林晓光：“试析日本国际新秩序构想”，《日本学刊》，1992 年第 4 期，第 18-30 页。

⁸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1995, pp.90-102.

⁹ 约瑟夫·奈、张哲馨：“自由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8 期，第 70-73 页；约瑟夫·奈：“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5-16 页。

以扩大“自由世界”的势力。但随着美国体系安全压力的降低，美国对一个在高技术领域持续发展的日本经济产生极大的疑虑，由于日本本身并没有通过经济扩散获得地区的“实质领导力”，日本在遭遇美国压制时很难获得地区的支持。对此，东亚战略的设计者约瑟夫·奈曾提到“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在国际政治秩序之上”，安全就像氧气一样重要。¹⁰

第四，在假性领导力向实质性领导力转移中，需要某种历史性机遇和自身的战略谋划能力。这种历史性机遇在过去表现为世界大战，即大规模的集团间（而不仅是两个国家间）战争重组了政治经济体系，改变了竞争规则和治理规范。而战略谋划意味着对历史性机遇的把握能力，即本国是否做好了抓住历史性重组政治经济体系的准备。由此看来，日本利用了冷战机遇，但却没能利用好冷战后机遇。日本尽管从 80 年代开始具有做政治大国的准备，但这种准备却因为冷战结束后缺乏与美国周旋的战略空间而夭折。

第五，亚太地区秩序的调整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主导全球战略的是均势原则，主导亚太秩序调整的是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平衡性把握。一般性而言，美国存在着地区战略，但没有周边战略，其地区战略服从于全球战略。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平衡苏联的影响力，美国成功拉拢中国；90 年代，为了拉拢日本，美国又将中国引入美国体系中制约日本。因此，在这两轮最终证明有利于美国的亚太秩序调整中，中日关系的性质和状态是关键，而美国对中日关系性质和矛盾的平衡性把握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如果没有日本依附，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过来讲，对中国而言，没有日本支持的亚洲战略更难以取得成功。

三、未来十年亚太秩序的演进方向

在有关国际秩序转变的讨论中，多数都将经济实力的变迁视作秩序变迁最根本的动力。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美欧经济遭受重创，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显现出活力，特别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西方相对衰落态势下，中国的崛起效应被放大，有关亚太地区秩序的论辩进入新阶段，出现了以中美为中心“G2”的秩序演变态势。¹¹中美两国政府都表示不接受所谓“G2”的称谓，而是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重蹈历史上新兴国与守成国的战争悲剧。但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¹⁰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1995, pp.90-91.

¹¹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T.com*, January 13, 2009.

Roy) 指出的, 尽管中美两国试图创新, 但实际行动与官方声明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¹²

引发这种差异的一项重要因素是亚太的力量对比呈现出多极态势, 在战略关系上则存在多重性。比如, 美国、日本的力量相对下降, 中国、印度的力量绝对上升。2012 年,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 中国名义 GDP 是美国的 53%, 是日本的 138%; 印度名义 GDP 是美国 12%, 是日本的 31%。¹³与 1971 年相比, 中印的经济地位显然上升很快; 与 1991 相比, 印度当前的地位也大大超过当年中国的地位。在战略关系上, 美国“再平衡”战略已经引发了地区关系的重组, 与前两轮调整时中国、日本围绕美国转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 本轮地区秩序调整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平衡更难以把握。

绝大多数战略分析报告在展望未来亚太秩序时, 都将中美作为分析框架和核心, 尽管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美国主导或者中国主导。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 (Hugh White) 认为, 未来新秩序的特征将回归 19 世纪的大国协调 (Concert of Power), 核心是美国、中国分享其领导力, 中美相互承认和接受彼此的政治体系、国际利益。在这种秩序下, 美国接受霸权的丧失, 对等地对待中国, 而中国也必须放弃很多, 比如接受印度、日本作为亚洲未来对等的力量。¹⁴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 2010 年发表的《权力与选择: 亚洲的安全未来》报告, 认为未来存在着美国主导、亚洲均势、亚洲协调和中国主导四种安全模式, 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旨在阻止霸权战争的大国协调秩序。¹⁵该报告的论点实际上与怀特的看法有类似之处, 不过该报告并不看好中国主导的模式。再比如, 日本东京财团在其 2011 年发布的《日本安全战略》报告中, 也将未来 10-20 年, 中美实力对比以及中美关系状态作为分析框架, 得出了四种安全模式, 即美国主导下的中美和谐模式、美国主导下的中美对抗模式、中美权力均衡下的合作模式以及中美均衡下的对抗模式。报告认为, 未来 20 年美国在实力上仍将压倒中国, 关系可能走向对抗性, 即第二种模式。¹⁶

鉴于日本全球第三大经济地位, 其对秩序的构想显然不同于第 12 大经济体澳大利亚。日本在前两次亚太秩序转换中, 都试图凭借其经济地位从美国手中获得一部分权力。未来十

¹² 参见 J. Stapleton Roy, “Thoughts on Strategy from a Career Ambassador”, September 5, 2012, <http://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thoughts-strategy-career-ambassador>。

¹³ 数据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¹⁴ Hugh White,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No 39. September 2010, Black Inc, Collingwood Victoria.

¹⁵ Malcolm Cook、Raoul Heinrichs、Rory Medcalf、Andrew Shearer, *Power and Choice: Asian Security Futures*,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0.

¹⁶ The Tokyo Foundation,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tegration, Balancing, and Deterrence in the Era of Power Shift*, Tokyo, October 2011.

年，印度经济仍然难以超过日本，因此日本将继续使用其强大的经济能力扩大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而美国为了防范中国独大，也将继续使用均势原则，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在 2012 年 8 月通过的第三份“阿米蒂奇-奈报告”中，美日双方都认为美日同盟是亚洲繁荣的基础，并且要求日本在今后的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¹⁷

与澳、日相比，亚洲的另一个经济崛起国印度，其外交战略显示出更强的独立自主性。在 2012 年 2 月公布的《不结盟 2.0 版》报告中，印度战略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十年，除美国外，中国、巴西将和印度一样逐步发展壮大，但俄罗斯与日本则是下降态势。报告强调，21 世纪不会重复 20 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历史，尽管中美是超级大国，但其他权力中心和枢纽也对秩序的塑造有很大作用，印度要避免成为中美冲突中的一方。¹⁸

显然，无论是美国的同盟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是具有不结盟传统的印度，在未来的亚太秩序构想中都不愿意只做美国的附庸，但也都不愿意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因此，讨论未来十年亚太秩序时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亚太经济秩序是否朝着中美两极前进？按照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的判断，“东亚正在出现可以说是两种相异的等级体系。一个是由美国主导的安全层级体系，另一个则是由中国主导的经济等级体系。”¹⁹在这段话中，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伊肯伯里对东亚的两个等级体制的分析是着眼于未来，即“正在出现”，但目前还不是完全如此。我们不应该忘记，1995 年，美国制定对日本的新东亚战略时，日本经济总量曾达到美国的 72%，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5 年日本 GDP 是中国的 7.5 倍。但 20 世纪 90 年代时从来没有人说东亚出现美日两个等级体系，或者日本主导东亚的经济等级体系。即便着眼于未来，按照 IMF 的预测，2018 年，中国名义 GDP 将占美国的 71%，届时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 2.5 倍。显然，2018 年的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在结构性上弱于 1995 年。如果说 1995 年未曾出现美日两极说法，那么到 2018 年更不应该出现中美经济两极说法。

如果时间进一步延长至 2023 年，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基于购买力平价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²⁰如果按照 IMF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预测，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是

¹⁷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12.

¹⁸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Delhi: The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2012.

¹⁹ [美]约翰·伊肯伯里：“地区秩序变革的四大核心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8 页。

²⁰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 p.16.

www.dni.gov/nic/globaltrends.

2017 年。但是，在购买力评价意义上超过美国意义何在呢？或许中日关系是一个参照，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IMF 的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是 2002 年。在 2002 年以后的几年中，中日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更为波动的时期。

因此，所谓中美经济两极的说法，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而是从战略意义上的一个判断。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相比，在经济意义上，中国与日本的地位将互换；但在战略意义上，中国已从美国的准盟友，转变为战略竞争者。随着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态势加剧，日本将担当起以往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角色，即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不过，对美国而言，仅有日本还不足以防范中国崛起潜在的威胁。为此，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启动了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则启动了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TPP）。

TPP 正是美国意图从经济上控制中国崛起进程的重大战略规划。由于中国的崛起首先是亚太的崛起，其次对全球具有影响力。因此，美国在经济上就必须设计一项兼顾地区和全球考量的经济战略，而 TPP 正中下怀。2009 年 11 月，奥巴马在东京宣布美国将参与 TPP 谈判，当时的鸠山政权还在讨论东亚共同体，美国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美国继续作为旁观者对亚洲事务发表意见，恐怕就要被清除出亚洲。美国此次吸取了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教训，开始积极参与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由于美国的参与，地区合作的核心由“东亚”逐步转变为“亚太”，自由化的目标和范围都要宽广得多。2013 年 7 月，日本首次参与 TPP12 国谈判，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条约体系具备了完整的经济联系，中国仅仅通过双边关系将更加难以改善对日关系，中国周边对华的包围圈将更加完整、坚固。首先，中国以中低端制造业出口将直接受到关税水平和原产地规则的制约；其次，中国的地区经济和政治作用会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美、日在分离周边国家对华深度经济依附上有很强的影响力；最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合作体系会逐渐确立。即便最终中国被纳入 TPP 进程，但由于美国控制规则制定，以及亚太地区最终的几个经济体已经嵌入美国的 TPP 体系，那么中国还将极大地依赖美国市场，增加了经济与安全的脆弱性。

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关注美国，也需要关注亚太的其他经济势力。正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的，“与美国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崛起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目前崛起所发生的背景不仅包括与其它大国的较劲，而且它的崛起还高度依赖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持续稳定。”²¹对此，严肃的中国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发展与地区形势的互动性。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认为，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至多是新闻记者的观察而非严肃的研究，中美

²¹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曼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2-93 页。

两国都不能忽视亚太其它国家合力维持地区稳定的决心。²²为此，中国也要重视印度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的需求，要深入认识韩国在链接中国中心的亚洲与美国中心的太平洋之间所扮演的角色。

从外部环境而言，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仅得益于美国塑造的全球开放秩序，也得益于东亚独特的生产网络。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亚洲地区主义形成了独特的模式，即市场驱动、多种速度、多种轨道的一体化进程。²³东亚与东南亚两个次区域是亚洲次区域内贸易最为紧密的地区，而从次区域之间的贸易衡量，则太平洋岛国与亚洲其他次区域的贸易最高，占岛国总贸易额的 60%，其次是东南亚，占 44%。²⁴太平洋岛国的贸易主要是初级产品，东南亚的主要次区域间贸易对象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其产品主要是中间品。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随着地区内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和进一步实施，亚洲大陆的经济整合将更加强势，这不仅对美国形成压力，也对日本构成平衡的难度。因此，与前两次亚太秩序的转换取决于美国以及美国利用中日平衡不同，未来的亚太秩序必须要面对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采用更为多元的手段。

四、结论

大国力量对比及其战略关系构成亚太秩序的基础。历史上的亚太秩序转变，多数时候以全球性国际秩序的转变为主要动因，而其手段主要是体系性战争。随着美国强力介入东亚事务，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之后，亚太秩序转换的核心动力就变成了中美日三方，其中美方还是主导地位，中日互为平衡，手段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平衡。

随着中国崛起，亚太地区多数国家以中国实力上升、美国相对衰落为框架分析未来十年的亚太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未来十年中国能够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而且按照历史上的中美日经济关系看，2018 年美中日三边经济关系的结构性要弱于 1995 年的美日中三边，因此所谓“正在出现的两种相异的等级体系”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战略

²² Zha Daojiong,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RF/ADMM Functional Cooperation”, September 20, 2012, The Tokyo Foundation,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topics/japan-china-next-generation-dialogue/asia-pacific-regional-security-cooperation>。

²³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 Integration Monitor—July 2012*,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²⁴ Ibid., p.16.

意义上的。

未来十年，中国将显著拉开与地区内国家的经济差距，但多数亚太中等国家，其战略界对未来秩序的构想尽管以中美为中心展开，却希望中美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中美既不单独主导地区秩序，也不破坏现有的稳定秩序。地区内国家更愿意寻求一种开放性的地区秩序，根据各自的战略利益需求，以多轨的形式、在不同的亚太次区域中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及对外战略。因此，未来十年，亚太秩序不会由美国主导，但也轮不到中国来主导，对中国而言，特别要加以重视的是，在以中美为中心的秩序框架之外，寻求更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因素与新动力。

用动态思维分析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

——兼议中国外交的软实力

张弛

【摘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并简要评析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作者先评析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指出其不足之处，而后就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主张运用动态思维分析国际关系中实力的软硬；认为实力软硬是相对而言的感觉，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接受程度的不同，实力可分为硬实力、软实力和协商实力；对实力软硬的分析可从横向性、纵向性和相对性三个角度进行。近年来，中国外交及国际行为的软实力主要体现为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友好政策。

【关键词】 软实力；国际关系；动态思维；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张弛，中国国防大学讲师，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博士。

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Zhang Chi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oft power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recent years. After presenting a critique of the soft power theory developed by Joseph S. Nye, the paper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soft power. The author proposes a dynamic analysis of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gues that whether a power resource is soft or hard depends on the perceptions and feelings of various actor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Due to the varying degrees of acceptance, power can be divided into hard power, soft power and bargaining power. An analysis should look at the soft or hard effectiveness of a power resour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 horizontally, vertically and relatively. Recently, the soft power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behavior has mainly been manifested in multilateralism, economic diplomacy and a good-neighborly policy.

【Key Word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ynamic analysis, China's foreign policy

【Author】 Zhang Chi, Lecturer at The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LA China; Doct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过去二十年里，软实力概念由西方传入中国，不仅在学界广泛应用，也对国家大政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提高文化软实力已提上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¹

同时，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也日益凸显，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国际关系学界而言，中国外交的软实力是如何体现的，怎样才能更好地展现中国外交的软实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应该采用何种思维方式或理论模式，才能更好地分析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

我国学界对软实力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都采用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的软实力理论。不少学者倾向于直接接受和应用这个理论，很少对该理论本身进行探讨和质疑。结果，该学说的不足之处往往被忽视，这个不足就是用比较机械和静态的思维分析软实力。因此，有必要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进行一些探讨、反思和补充。

笔者主张运用动态思维分析国际关系中实力的软硬；同一种实力资源对于不同对象、使用方式不同或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软硬效果可能不同，且这种效果会随时代和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根据接受程度不同，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可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软实力（soft power）和协商实力（bargaining power）。分析实力软硬可在横向性、纵向性和相对性这三个维度上进行。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多边外交、经济外交和睦邻友好政策。

一、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探讨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是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出的，具有很强的政策针对性。²他认为，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愈发重要，美国应学会运用巧实力（smart power），即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至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定义，约瑟夫·奈认为，实力就是影响他人行为，

¹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30页。

²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的三本著作中，一是1990年出版的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注定要领导世界：美国实力变化着的属性》，二是2002年出版的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三是2004年出版的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

从而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硬实力是一种强制力，主要包括军事、经济、科技；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主要包括文化、价值观、政策。他对不同实力的政策选择和表现形式做了区分：硬实力中，军事实力的表现形式包括威慑外交、战争和结盟，经济实力的表现形式包括援助、贿赂和制裁；软实力的表现形式包括公共外交、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³

该理论主要有三个积极意义。一是强调了软实力的重要性，敏锐地察觉到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正不断增大。二是首先使用了“软实力”这一概念，将国际关系中的实力资源区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三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调整外交政策，注重运用软实力，从而更好地实现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目的。

但该理论也存在三个不足。一是对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分过于简单和绝对。二是部分论述与现实不符。三是对软实力范畴的界定不够科学。

1.对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分过于简单和绝对

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和硬实力在概念上的划分过于简单和绝对，容易自相矛盾。他对实力软硬的分析主要在静态思维层面，即机械地把各种实力资源对号入座，贴上软实力或硬实力的标签。这导致该理论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根据该学说，硬实力是一种强制力，表现为军事和经济；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表现为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另一方面，基于国际关系的现实，该理论又指出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可以催生软实力，一些国家很可能被另一些国家的硬实力（如不可战胜的军事实力）所吸引；同样，一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也很可能导致该国失去吸引力；因此，硬实力有时候具有吸引力和软的一面，同一种资源可以催生从强制力到吸引力的整个行为模式。⁴

换言之，同一个实力资源时而表现出软实力特征，时而表现出硬实力特征，这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但约瑟夫·奈对这个现实的清楚认识显然和他自己对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定义上的简单划分自相矛盾。即使像军事和经济这样被他归入硬实力范畴的实力资源，也可以呈现软实力特征，而他并没有在理论上把这个矛盾解释清楚。

另外，他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表现形式也作了过于简单的划分。例如，硬实力中，军事实力的表现形式包括威慑外交、战争和结盟；经济实力的表现形式包括援助、贿赂和制裁；软实力的表现形式包括公共外交、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图1）。但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无

³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2-11 and p. 31; and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9.

⁴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10; and Nye, *Soft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9 and p. 26.

论威慑外交、结盟还是援助、制裁，都是通过双边、多边外交来进行的（图2）。这种理论划分上出现的重叠和矛盾也说明了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一种实力资源既可能是软的也可能是硬的。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并没有对实力的软硬关系在理论上做出清晰明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图 1：约瑟夫·奈对不同实力表现形式的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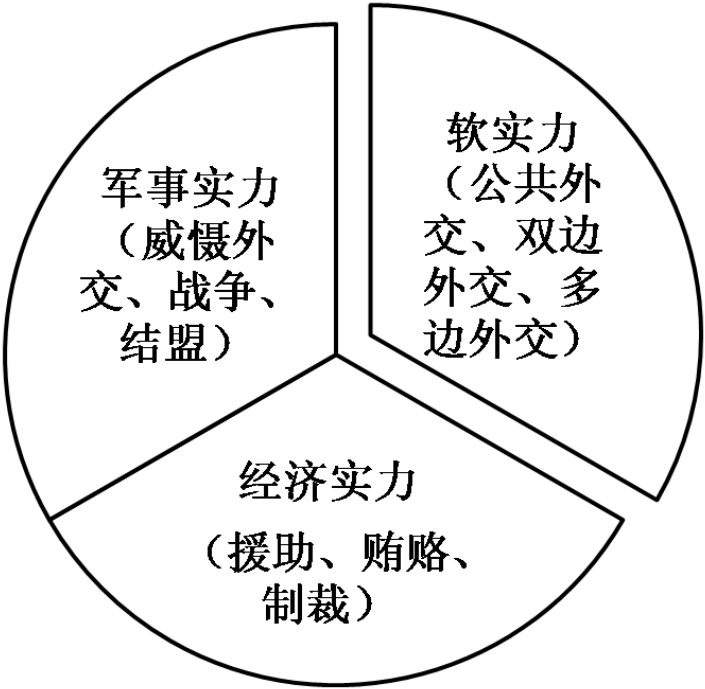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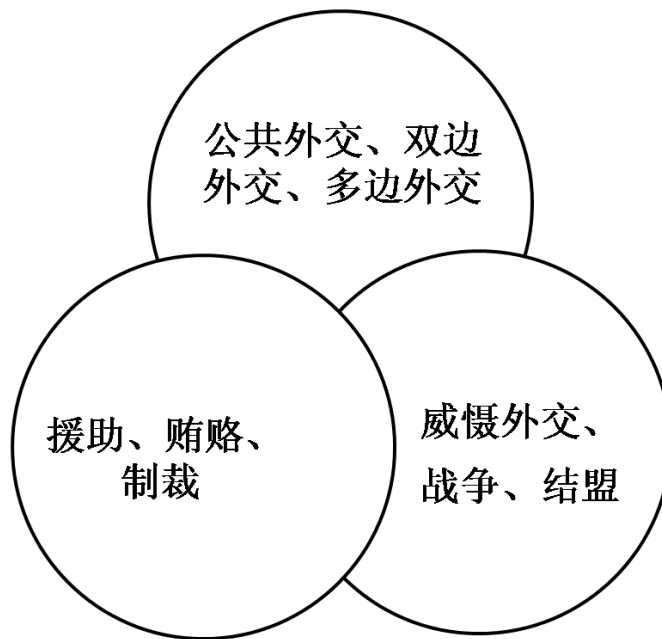


图 2：实力的不同表现形式在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关系



2.部分论述与现实不符

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中，部分论述与现实国际关系有所出入。该理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有时候只凭借软实力就能达到目的；如果一些国家崇拜某国价值观、效仿该国样板、渴望实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那么，该国就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追随，达到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目的。⁵但这种论述很难体现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例如，世界上不少国家羡慕美国的价值观，并希望变得和美国一样富强，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国家会不假思索地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崇拜美国价值观的国家，可以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巴基斯坦虽然倾向于认同美国的民主政治价值观，但并不完全赞同美国的外交政策。约瑟夫·奈简单地认为，对一国价值观的喜欢可以自动转化为对该国外交政策的支持，这种逻辑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有所出入。

3.对软实力范畴的界定不够科学

约瑟夫·奈对软实力范畴的描述和界定不够科学，没有科学区分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和其他领域的软实力。他在描述美国软实力的时候，列举了移民人数最多、电影电视最受欢迎、高等教育发达、诺贝尔奖得主多、美国流行文化发达等；在描述日本软实力时，列举了专利数量、研发水平、对外援助、人均寿命、跨国公司等；在描述中国软实力时，列举了经济发展快、电影《卧虎藏龙》、姚明等。依照这种逻辑，软实力清单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且不论上述其中几项到底属于约瑟夫·奈自己所定义的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单看这一长串清单，

⁵ Nye, *Soft Power*, p. 5.

不少是对国际关系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因素。显而易见，事实并非中国人喜欢看好莱坞大片，中国政府就会在外交上配合美国。软实力范畴无限扩大化的倾向，使约瑟夫·奈的理论很难科学地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

约瑟夫·奈将美国流行音乐、麦当劳、好莱坞等流行文化归入软实力范畴。这些东西虽然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并不能对国家行为产生很大影响。很多人听美国音乐、看好莱坞大片、吃麦当劳，但也毫不犹豫地高呼“反美”口号进行示威游行。一个典型例子是伊拉克战争期间，在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美国在欧洲的铁杆盟国以及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许多西方青年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或反美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所在国政府对待美国和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也使得经常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政府信誉受损。一旦政权更迭，西班牙和意大利立刻做出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甚至连当时的英国布莱尔政府也备受国内压力，不得不宣布从伊拉克撤军，使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的美国“雪上加霜”。可见，美国流行文化这一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至少在伊拉克战争这样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没能帮助美国实现其政策目标。

对于民众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喜好并不总能促使其所在国政府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这一现象，约瑟夫·奈给出的解释是：流行文化不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所以并不总能产生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⁶ 但问题不在于政府能否直接控制这些资源，即使经济制裁和武力威吓这样的美国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行为，也不见得一定能达到目的。根本原因是，流行文化这样所谓的软实力或许能让一部分民众感兴趣，但对于外交政策并不见得有重大影响。说到底，国际关系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国家利益才是主权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简言之，约瑟夫·奈一方面将软实力范畴不断扩大，超出了国际关系领域，另一方面试图用这样的学说来分析国际关系，使该理论的说服力打了折扣。

二、分析国际关系中实力软硬的动态思维

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静态思维有其不足之处，因而有必要超越该学说来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实力软硬。笔者主张运用动态思维分析国际关系中实力的软硬。无论什么样的实力资源，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同一种实力资源对于不同对象、使用方式不同或在不同环境下，产

⁶ Nye, *Soft Power*, p. 52.

生的软硬效果可能不同，且这种效果会随时代和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根据接受程度不同，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可分为硬实力、软实力和协商实力。对实力软硬的分析可在横向性、纵向性和相对性三个维度上进行。分析实力软硬关键看两个要素——受力者和施力者，他们既可以是国家和政府，也可以是国内或跨国的利益集团。某种实力的软硬往往是相对而言的感知，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言。

1.软实力、硬实力和协商实力的定义

硬实力：如果受力者被动、不情愿、被迫地接受某种实力及其导致的结果，该实力就呈现硬实力特征。例如，二战中法西斯的军事实力对于被侵略国家来说是典型的硬实力；同理，反法西斯的军事实力对于法西斯政权来说也是硬实力。再如，冷战后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各种手段强迫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以“华盛顿共识”为主的改革方案，也往往表现出硬实力特征。

软实力：如果受力者主动、自愿地寻求、接受某种实力，该实力就呈现软实力特征。比如，弱小国家寻求大国提供的军事和安全庇护，大国的军事保护对于那些小国来说就具有软实力特征。又如，“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其西欧盟国运用软实力的经典案例。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应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请求援建坦赞铁路，是我国在国际上施展软实力的范例。

协商实力：如果施力者运用的某种力量既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让受力者主动接受，也不具备足够的强制力让受力者被迫接受，而是通过双方平等协商、谈判、妥协之后达成协议，从而实现某种局面，那么这种介于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实力就是协商实力。这种情况多见于双边和多边国际机制中的外交博弈。比如，中国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为此与东盟国家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就是运用了协商实力。

2.实力软硬的具体分析

除了进行概念上的区分，还要采用动态思维，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待实力软硬。下面从横向性、纵向性和相对性三个维度分别阐述。

一是实力软硬的横向变化。同一个施力者运用的同一种实力资源在同一个时代，对于不同的受力者来说，感受到的软硬程度是不同的（表1）。比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同盟关系及中东战争中美对以的援助，对一些阿拉伯国家来说是硬实力，但对以色列而言又具有软实力特征。又如，美国近年来推行的“颜色革命”，对那些国家亲西方的反对派和利益集团而言是软实力，但对执政党和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则是硬实力。再如，欧盟和北约的东扩对那些希望加入这些组织的东欧国家来说是个软实力，但对俄罗斯而言，它只能感受到来自西方的硬实力正在蚕食其传统势力范围。

表 1：国际关系中实力软硬的横向和纵向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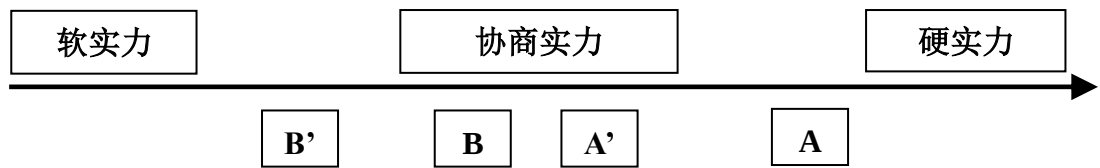
实力软 硬的变化	施力者	实力资 源	时代 环境	受力者	软硬效 果
横向变 化	相同	相同	相同	不同	不同
纵向变 化			不同	相同	

二是实力软硬的纵向变化。施力者和受力者相同的情况下，实力软硬会随时代和环境变化而变化（表 1）。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大力援助当地伊斯兰武装分子对抗苏军。对这些武装分子来说，当时美国的军事实力表现出一些软实力特征。但时过境迁，“9·11”事件后，美国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政策，这时美国的军事实力对这些伊斯兰武装分子来说就是硬实力了。再如，美国曾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当时美国的军事实力对萨达姆而言是软实力。但 1991 年海湾战争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断送了萨达姆政权及其本人的性命，这时美国的军事实力对萨达姆来说就是硬实力了。

三是实力软硬的相对性。虽然笔者将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在概念上划分为硬实力、软实力和协商实力，但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不应刻板地局限于这三个概念，而要注意某个实力或行为同别的实力或行为相比较而言的“较软（softer）”或“较硬（harder）”。图 3 是国际关系中两国实力和行为软硬对比的简单示意图。箭头指向表示某国所使用的实力或所采取的行动在严格定义上从软到硬的程度变化，A 和 B 代表两个大国。假设在处理国际事务时，A 国主要使用硬实力，偶尔使用软实力和协商实力（如图中 A 位置），B 国主要使用协商实力，偶尔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如图中 B 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 A 国和 B 国都没有经常使用严格意义上的软实力，但在国际社会看来，B 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显然要比 A 国“软”；换言之，在 A 国经常使用硬实力的反衬下，B 国的行为方式就显得相对“较软”了。依此类推，假设 A 国调整外交政策，在国际上主要使用协商实力，有时候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如图中 A'位置），这时如果 B 国遵循原先的外交政策，那么它的行为与 A

国新的行为相比，就很难显得“较软”了。因此，如果 B 国想保持相对 A 国行为的“较软”，那么它也得调整外交政策，比如经常兼顾使用软实力和协商实力，偶尔使用硬实力（如图中 B' 位置）。

图 3：国际关系中 A 国和 B 国实力软硬对比示意图



三、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软实力

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友好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和行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不是严格定义上的软实力，但是相比较美国的外交和国际行为，中国外交就显得“较软”了。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中，尤其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常忽视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习惯于通过军事打击和武力干涉解决问题，如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军事干预利比亚事务等。美国过度使用硬实力的国际行为，恰恰反衬出中国外交的软实力。

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缺少外部制约力量，美国愈发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也愈演愈烈。“9·11”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达到了顶峰，新保守主义主导了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制定，形成“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致使美国在国际上穷兵黩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小布什政府抛开联合国，不顾传统盟友反对，借口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拼凑“志愿者联盟”入侵伊拉克。

美国滥用硬实力导致国际社会一些成员对美国霸权的怀疑与厌恶。而与此同时，中国奉行“韬光养晦”及“和平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其低姿态的外交和国际行为并未妨碍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一方面，中国接受并深度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强调多边主义、经济外交、睦邻友好，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软实力。

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不仅接受了多边主义,且愈发成为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如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上海合作组织、朝鲜问题六方会谈、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⁷中国还针对自身情况,着力推行经济外交,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多边主义提供了基础和动力。随着中国日益频繁的领导人外交,这种以经济外交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已经走出亚洲,到达包括非洲、拉美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

此外,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处理领土主权纠纷。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同多数邻国存在领土纠纷。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式。中国在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上一贯坚持原则,且相当克制,有理有据有节。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解决了同俄罗斯的领土争议及同越南的陆上领土划界问题,还与东盟针对南海主权争议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最终通过谈判解决纠纷奠定了基础。

二是与邻国共享发展成果。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安邻”和“富邻”是对“睦邻”的补充和实质化。中国的睦邻政策又深深地寓于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之中;多边主义为睦邻政策提供了一种制度和机制上的保障,而经济外交则是实现“安邻”和“富邻”的方式。近十几年来,中国同世界各地的经贸关系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已成为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比如,中国已成为蒙古、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给这些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⁸再如,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过去十年中,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增长 4.12 倍,达 4001 亿美元,相互投资额增长 2.03 倍,达 1007 亿美元,互利合作不断深化。⁹

不过,近年来美国的战略东移和“重返亚洲”战略,使中国外交的软实力在周边尤其是东南亚遇到了挑战。与本世纪头几年相比,如今的美国外交“软”了不少,奥巴马甚至还因为“无核世界”的言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早前小布什政府对待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强硬和高压政策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最近几年,奥巴马政府调整了美国外交政策,实行了“较软”的政策向东南亚国家示好。为了制约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除了参与

⁷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中国已经加入了 130 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并签署了 267 个国际多边条约。

⁸ 人民日报,《打造与周边国家贸易“升级版”》,2013 年 8 月 5 日 第 23 版。

⁹ 人民日报,《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13 年 8 月 26 日 第 22 版。

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多边机制，还积极介入南海主权纠纷等区域事务，而美国的介入很可能受到同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国家的欢迎，因为这可以增加它们与中国博弈时的筹码。因此，美国软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对中国外交构成了挑战。是否需要或如何才能使中国外交和国际行为保持“较软”，是决策层和专家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四、结 语

本文探讨了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及中国外交的软实力。笔者认为实力的“软”或“硬”往往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感知，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笔者主张运用动态思维分析国际关系中实力的软硬；同一种实力资源对于不同对象、使用方式不同或不同环境下，产生的软硬效果可能不同，且这种效果会随时代和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根据接受程度不同，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可分为硬实力、软实力和协商实力。分析实力软硬可从横向性、纵向性和相对性这三个维度入手。根据这个理论框架，近年来在美国过度使用硬实力的背景下，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多边外交、经济外交和睦邻友好政策。

“民主政府”、利益集团与美国贸易政治 ——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例

董展育

【摘要】 研究美国贸易政治,对于解读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及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有重要的意义。构建一个“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分析框架,可以对美国的贸易政治进行准确的阐释:在美国贸易政治之中,政府和利益集团是最主要的行为体;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民主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做出抉择的结果,也是美国政府与利益集团进行政治互动的产物。对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案例分析,也说明了:正是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最终输出了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因此,理清美国贸易政治的逻辑,拓宽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推动双边自由贸易,能够有效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 美国贸易政治;民主政府;利益集团;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

【作者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terest Group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By Dong Zhanyu

【Abstract】 The study of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en interpreting U.S.A. trade policies and understanding China-U.S.A. trade relation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interest groups”, which argues that U.S.A. trade policies are not only the choices made by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between state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private benefits, but also the outcom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A. government and interest groups. The case study of the U.S.A. trade policies toward China since the new century also demonstrates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nterest groups ultimately shapes trade policies. Therefor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generate more mutual benefits for our two countries, and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bilateral free trade as well a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Key Words】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terest groups, trade policies

引言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着当今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美国的贸易政策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也主导着两国的经贸格局，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释放着深刻的作用。然而更需关注的是，在贸易政策的背后，有一整套关于贸易政策制定和输出的政治过程，即所谓的“贸易政治”。美国的贸易政策背后，也有其特有而复杂的贸易政治：植根于美国多元化的政治环境，社会力量得以广泛参与到美国的政治决策体系之中，与政治行为体形成频繁的政治互动和多维的政治博弈。在美国的贸易领域，不同政策主体或角色围绕着贸易政策展开了竞争、斗争、折冲与妥协，这便造就了特有的美国贸易政治，并最终左右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有鉴于此，有必要对美国贸易政治进行深入的探究。

对于美国贸易政治的研究，以往学术界将其纳入外交决策的研究范畴，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取得了理论成果，并分别形成了“霸权稳定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官僚政治分析法”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¹问题就在于，这些专注于单个分析层次的理论，在分析的维度上容易造成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割裂。而随后以罗伯特·帕特南（R. D. Putnam）和海伦·米尔纳（H. V. Milner）为代表的“双层博弈”理论，虽然实现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联系，但由于引入了过多的变量，其理论难以保证简洁性。²后起的贸易政治经济学引入经济学的方法重新解构了贸易政治，也同样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民主的政府”模型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³然而贸易政治经济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理论缺乏对宏观层面因素的考量，特别是忽视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对于国内经贸决策的制约；而其高度抽象化的模型也往往缺乏实证资料的有效检验。

基于已有的理论成果，本文创设“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分析模式，试图对美国的贸

¹ 具体的划分以及相关文献的回顾可参见沈本秋：“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分析——层次、视角与理论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122—142页。

² 相关的文献可参见 Putnam, Robert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 3, 1988, p.434. 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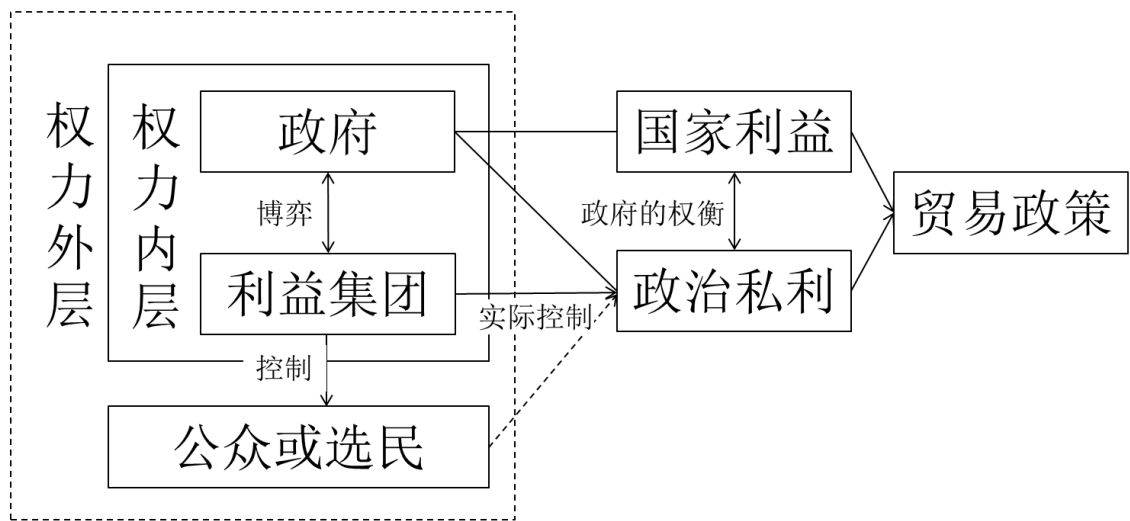
³ 相关的文献回顾可参见盛斌：“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01年第1期，第46—56页。

易政治提供新的理论解释。该分析模式聚焦于美国贸易政治中最主要的两大行为体——政府与利益集团,考量二者之间的利益选择与政治博弈是如何最终输出美国贸易政策。根据分析,美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既是“民主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做出抉择的结果,也是美国政府与利益集团进行政治互动的产物。利用该分析模式,本文还将考察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探究其政策背后一系列贸易政治的过程,从而对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也对新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作了梳理。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文章的第一部分为理论的构建,阐述“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分析模式。第二部分为案例的分析,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例做出探究。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归纳美国贸易政治的一些启示。

一、理论模式：“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分析模式

依据“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分析模式,根植于美国多元化的政治环境,美国贸易政治的权力可分两个层次:权力的内层为政府和利益集团,二者共同构成了“双头政治”的格局;而权力的外层则是公众或选民,它们对贸易政策会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的权力实际为权力内层的行为体所控制。本文关注权力内层中两大行为体的博弈是如何最终输出贸易政策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民主政府——利益集团”分析框架示意图

(一)“民主政府”：“国家利益”与“政治私利”的权衡

在“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是广义的概念,它代表了国家立法

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总合，是一个单一的政治行为体，它承担着贸易政策制定者和输出者的角色。⁴

基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借鉴贸易政治经济学“民主的政府”的分析模式，可以创设一个“民主政府”概念来模化美国政府：所谓的“民主政府”，一方面，它是独立的国家机关：在民主制度之下，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标准和行为目标，它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它是理性的官僚机构：政府会追求“政治私利”的最大化，它总会寻求连任从而长期占有政治资源，当然还包括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等经济资源。“民主政府”的目标函数必须兼顾反映“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

首先来分析“民主政府”的“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利益”，诚如莫顿·卡普兰(M. A. Kaplan)所言：“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在满足国家行为系统的需要时所具有的利益。这些需要的一部分来自国家系统内部，而其余的则来自于环境因素中。”⁵其中所谓的“环境因素”，即是指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因素，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既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又是一个国内政治的概念。基于一种宏观的视角，本文将“民主政府”所追求的“国家利益”视为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借鉴现实主义的观点，⁶本文将“国家利益”定义为“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民主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要考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关系，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民主政府”的美国政府，最大化“国家利益”的行为会深刻作用于其贸易政策。这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其中的机理，“霸权稳定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解

⁴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设定，是因为：其一，为了简化分析变量，保证理论的简洁性；其二，下文将证明，各政治行为体“政治私利”的“利益基础”是一致的；其三，本文的理论是基于中观层次的视角，不再聚焦微观层面的官僚政治。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设定的“政府”的概念，其实更偏向于“行政机关”的概念，这是因为立法机关在对外经贸决策中的实际作用微弱，诚如希尔斯曼等人分析的：“国会的权力显然是有限的，而且国会本身的程序和内部的紧张关系还进一步限制了它的权力。”（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 韦茨曼著，曹大鹏译：《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7页。）一个值得借鉴的例证是谢韬关于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的研究，他分析了1973年—2006年间美国国会提出的875条有关中国的议案，发现实际成为法律的只有15条。他的研究试图说明：国会议员可能并不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而是更倾向于向行政部门和选民发出某种政治信号。（参见谢韬：“如何看待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1973—2006年期间的中国议案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27—37页。）

⁵ 莫顿·A. 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⁶ 传统的现实主义“以权力界定利益”，认为在一个主权国家争夺权力的世界里，生存成为了国家利益的核心。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利益是在国际无政府的状态下确保其生存。而构建在新现实主义之上的“霸权稳定论”则认为，霸权国的国家利益是维持霸权国与系统内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的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

释。依据“霸权稳定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倾向于维持自由贸易体制，而霸权衰落将导致其保护主义的政策在全球蔓延。这一推论来自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即霸权国偏好自由贸易。⁷之所以霸权国偏好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与其追求维系霸权的“国家利益”密不可分⁸：第一，霸权国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能在道义上为国际社会成员提供效仿的榜样，从而获得“软权力”以进一步强化霸权的基础；第二，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以保证世界自由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是其霸权“合法性”的基础；⁹第三，霸权国在自由贸易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可以为其赢得比体系内其他成员国更大的权力，霸权国可据此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设定管理国际贸易的原则、规范和规则。可见，出于维系霸权的“国家利益”的考量，霸权国本身倾向于输出自由贸易政策。然而问题在于“霸权必衰”：一方面，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而经济剩余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经济伙伴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崛起，会对霸权国形成挑战。对此，霸权国会试图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采取一些政策来巩固其霸权，而“第一个最优化的政策是实施最适当的贸易限制，从而改善它的贸易条件”，¹⁰亦即为了挽救相对衰落的霸权，霸权国会输出贸易保护的政策。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霸权稳定论”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与行为极具解释力，通过以上“霸权稳定论”的分析，对于美国的贸易政治可以获得新的理解。

至此，可以对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决策做出如下的诠释：作为“民主政府”，美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国家利益”；而作为世界上唯一霸权国的美国，其“国家利益”就在于维系霸权。根据“霸权稳定论”，霸权国需要恪守自由主义并为国际贸易体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因此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会倾向于输出自由贸易政策；然而当面对霸权的相对衰落，为了挽救霸权，贸易保护的政策就会应运而生。

再来关注“民主政府”的“政治私利”。作为理性的官僚机构，政府会倾向于最大化其自身效用，即其“政治私利”。当然，广义“政府”内部的各机构，固然会各自怀有不同的利益考量，然而它们的利益基础是一致的。原因是，广义“政府”内部的各政治行为体，其

⁷ Gibson, Martha Liebler., *Conflict amid Consensus in American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

⁸ 具体的分析参见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页。

⁹ 国际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是最为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当然，国际公共物品还包括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等。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0 页。

¹⁰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6 页。

自身效用首要依赖于胜选连任以长期控制政治资源,以及包括利益集团政治献金等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其所谓的“利益基础”,有两个重要而共同来源——利益集团和选民。也就是说,不同政治行为体“政治私利”的内容可能并不相同,但是其“利益基础”是基本一致的。这样,本文就可以统一政府“政治私利”的概念:亦即“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支持”。为了追逐“政治私利”,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会偏好于那些能够获得选民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策。问题是,“民主政府”的“政治私利”和“国家利益”可能并不一致,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在两个利益当中做出选择。事实上,由于选民“理性无知”,利益集团得以操纵民意并由此成为了政府“政治私利”的最主要内容。所以,“民主政府”在对贸易政策进行决策的过程,既是其对“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抉择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具体的分析将在下文中做出。

(二) 利益集团: 博弈政府与控制选民

所谓的“利益集团”,是指“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¹¹利益集团在美国的贸易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能够与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输出者的政府形成制约与平衡,因此美国贸易政治呈现“双头政治”的格局。利益集团何以在美国的贸易政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其一,这与美国多元化政治的环境有关。在多元化政治的环境之下,利益集团能够凭借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并成长为最具行动能力的社会行为体。多元化政治过程是动态的,随着利益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对其它利益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多元政治环境之下的决策过程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这种决策过程是开放的、动态的,因此政治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渗透。¹²诚如罗伯特·达尔(R. A. Dahl)所说:“政治阶层不同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异质性保证了任何不满的集团都能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代言人。”¹³因此,强大的利益集团便有机会渗入公共权力,继而成为能与政府角力的政治力量。

其二,利益集团本身也是政府“政治私利”的一部分。多元化政治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集团得以广泛地介入政治选举的过程之中。罗杰·希尔斯曼(R. Hilsman)等人指出了利益集团具有集合利益和追加代表的作用:利益集团至少代表了一群人的民意,同时,利益集

¹¹ Truman, David Bicknell.,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Knopf, 1971, p.33.

¹² 参见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40 页。

¹³ Dahl, Robert Alan.,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93.

团的结构是政府有效管理庞大而复杂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¹⁴所以在代议制下，利益集团是民主政府重要的政治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政治基础在一些制度——如竞选财政制度——的作用下，会被进一步地加强和拓宽。¹⁵由此，利益集团成为了政府“政治私利”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是政府获得民意的政治基础，还是保障政府在位的经济基础。当然，利益集团一般并不对决策形成直接的作用，它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从而间接地对决策产生作用。政治献金无疑是重要的砝码，然而利益集团还拥有其他影响决策的手段：游说是最普遍的方式，发动游行示威、举办讨论会、发行书籍报刊、制造舆论等也是利益集团经常使用的手段。另外，利益集团影响决策的途径也非常多样：它们可以向国会或行政当局提供信息、决策依据和政策选择，也可以借助诸如听证会等机制来纠正损害本集团利益的政策。¹⁶运用不同的手段，配合不同的途径，利益集团得以在贸易政治中与政府展开各层次的博弈，进而对政策的制定施加重要的影响。

其三，利益集团控制了政府的选民基础。选民无疑是民主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来源，选民的支持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在位或能否连任，因此选民似乎是民主政府“政治私利”的最主要部分。然而事实上，民主政府的选民基础实际上也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其中的作用机制可以用“理性无知”理论来解释：“理性无知”理论首先假定选民是“理性的”：选民在对政策进行判断和选择时，会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来判断和选择政策需要信息。那么当选民对信息的预期收益相对于成本来说很小的时候，选民几乎不购买信息，正如安东尼·唐斯（A. Downs）所说：“寻求政治的博识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信息所能提供的低廉回报简直不能补偿他们在时间及其他资源方面付出的成本。”¹⁷所谓“信息的预期收益”，就是选民从选举当中所获得的收益。关键在于，选民参与选举的收益到底有多小？实际上简单的统计学原理就能证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边际影响的概率极小，远远小于他们在投票路上遇到交通意外的概率。由此看来，选民去投票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那么选民参与选举的意义又何在呢？杰弗里·布伦南（G. Brennan）和洛伦·洛马斯基（L. Lomasky）的“表达性投票”模型则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人们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而是为了

¹⁴ 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 韦茨曼著，曹大鹏译：《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37—338 页。

¹⁵ 在美国，竞选财政制度赋予了利益集团在重要选举活动进行竞选捐赠的权利，利益集团成为了政府在选举政治中实现胜选连任的经济基础。关于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及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可参见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2—199 页。

¹⁶ 关于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途径，可参见陶文钊：《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7 页。

¹⁷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p.259.

显示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同时也恰恰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¹⁸这便给了利益集团可趁之机：利益集团凭借发动游行示威、举办讨论会、发行书籍报刊、制造舆论等手段，可以在公众之中制造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仅能为“理性无知”的选民提供富有倾向性的信息，而且塑造了具有倾向性的社会环境，由此最终主导了选民的政治倾向。¹⁹可见，由于“理性无知”，选民的倾向为利益集团所主导，因此政府的选民基础实际上也为利益集团所控制。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对美国贸易政治中的利益集团做出这样的解释：在美国的多元化政治环境之下，利益集团成长为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并广泛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和政治献金是美国政府在位并连任的重要资源，利益集团具备了制衡与博弈政府的基础，它们进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在贸易政治中与政府形成角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选民的“理性无知”，利益集团实际掌控了政府的选民基础，构成了政府“政治私利”的主要内容。由此，利益集团在美国的贸易政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奠定了美国贸易政治“双头政治”的局面。美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就是政府与利益集团冲突、博弈、妥协与平衡的产物。

（三）理论总结：“民主政府”与利益集团的角力

至此，本文大体完成了对“民主政府—利益集团”分析模式的构建：本文的理论聚焦于美国贸易政治中最重要的两大行为体——政府和利益集团，考察二者是如何进行博弈和角力从而输出贸易政策的。在这一分析模式下，“民主政府”需要对“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做出权衡和取舍：基于“国家利益”，政府要保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政府，则要依据其在国际体系中霸权变化的情况来调整它的贸易政策。另一方面，政府的“政治私利”来自于选民和利益集团的支持，但实际上是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在多元政治的环境之下，利益集团具备了可与政府博弈的力量，而利用选民“理性无知”，利益集团

¹⁸ Brennan, Geoffrey, and Loren Lomasky, eds., *Democracy and Decision: The Pure Theor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⁹ 政治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民主制度下所存在的这种困境，即民主的过程实际为少数集团所左右。多元主义理论家就指出，正式的民主过程——选举——具有局限性，尽管选举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Ryden, David K., *Representation in Crisis: The Constitution, Interest Groups, and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20.）公共选择的理论家对此作出的解释是，普通大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位置分散且互不相识，难以形成联合的力量对政治决策形成强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虽然为数不多，但牵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认识且容易协调，对政治决策能够施加持久而有力的影响。（参见布莱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更是掌控了政府的选民基础。因此，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是“民主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抉择的过程，也是“民主政府”与利益集团进行角力的过程：当“国家利益”与“政治私利”相一致，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时，相关的贸易政策就可以顺利输出。而当“国家利益”与“政治私利”相背离，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偏好不一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冲突和博弈，此时贸易政策就成为了两大行为体相互妥协的结果；那么在多数情况下：政府维持其主导的政策不变，而在具体的贸易问题上对利益集团做出让步。

二、案例分析：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以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上文提出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新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历了三届政府，由于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作用关系不同，三届政府最终输出的对华贸易政策也有所区别。本部分对案例的选择，既保证了时间的连续性，也保证了案例中各变量的不同取值，实现了案例之间的有效比较，是对本文理论模式较为科学的检验。

（一）克林顿执政末期：助华“入世”与 PNTR 立法

进入新世纪，克林顿政府也到了执政的末期，然而就是在这相当短暂的时间内，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采取相当自由的贸易政策，不仅推动国会通过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 PNTR）的法案，还最终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 WTO）。中美经贸关系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然而仔细考察这一阶段的美国贸易政治，可以发现美国对华的自由贸易政策背后，藏有深刻的战略含义。得益于新经济的勃兴，美国在 20 世纪末进入了霸权复兴的时期，因此美国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以其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并试图利用制度性的霸权体系将挑战国纳入治下。²⁰对于中国的崛起，作为霸权国的美国自然心存芥蒂。因此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克林顿政府就调整了对华政策，实行对华“接触”战略，其实质则是希望把中国引入国际体系来管束中国的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目的。正是基于国家利益层面维护霸权的考量，克林顿政府转而极力推动对华 PNTR 并积极助华“入世”，对华大开自由贸易之门。

当然，美国的贸易政治是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的过程，美国政府调整对华贸易政策还需

²⁰ 突出的表现包括克林顿政府在 1993 年促使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法，在 1994 年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并在是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上积极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组织化和制度化。

要顾及国内各社会力量，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声音。这在美国对华 PNTR 问题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对于 PNTR 问题，受益于中美贸易的广大工商利益集团是最积极的支持者。这些利益集团都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力量强大。²¹为了促使国会通过对华 PNTR 法案，工商利益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²²：第一是展开各层次的游说。为了游说国会支持授予中国 PNTR，美中贸易商界联盟甚至举行定期协商，指挥工商界对国会的游说活动。而各类工商组织与各大公司也发起了大规模的基层游说活动，宣传中国加入 WTO 将给美国地方经济带来的好处，并动员基层群众向本选区国会议员施加压力。第二是投入巨资进行广告宣传。商业联盟出资 150 万美元的广告费来支持 PNTR，而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两个组织在广告上的投资更是高达 1000 万美元，这些广告在公众之中有力地促成了支持 PNTR 的民意。第三是展开一系列政治捐款。为推动两党领导人支持 PNTR，商业圆桌会议的公司“排着队”为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捐款，确保两党政纲在贸易问题上反映工商业利益。²³在此过程中，虽然有以劳工组织为代表的少数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扰，但是在美国政府与工商利益集团的合力作用下，200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 PNTR 的立法。至此，中国“入世”的障碍基本被扫平，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上可以看出，由于霸权的复兴，美国积极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并希望将潜在的霸权挑战国纳入其之下。正是基于这一国家利益的考虑，克林顿政府在其执政末期积极推动中国“入世”。另一方面，实力强大的工商利益集团也支持中美贸易的发展，它们的诉求通过国会的 PNTR 立法得以实现。由此，在对华贸易政策的问题上，政府与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政府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私利”相一致，这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基调。

（二）小布什执政时期：督华履约与贸易摩擦

经历了短暂的克林顿政府末期，新世纪之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很快进入了小布什执政的时

²¹ 具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包括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电子工业联盟、美国保险业协会等。其中，美国商会的会员包括 300 多万家工商业企业、2800 个州和地方商会、830 个工商业协会和 96 家海外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则包括了 150 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所代表的企业雇员总数达上千万人；另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了 200 多家会员企业，而美国电子工业联盟也拥有 2000 多家会员公司。参见陶文钊：《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3—275 页。

²² 工商利益集团的具体行动方法和策略，可参见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4—96 页。

²³ 到 2000 年 6 月，在两党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募集的 935 万美元资金中，67.3%来自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公司。参见陶文钊：《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0 页。

代。在这一时期内，美国政府虽然对华坚持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背后的贸易政治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克林顿政府成功的经济政策使美国再次获得了维持霸权必不可少的“经济剩余”，大大增强了美国在国际上推行“弥赛亚式”的霸权干预战略的物质力量。因此当小布什上台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试图向世界输出霸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无不展现着美国基于霸权实力的一种“新帝国主义”的狂热和躁动，这也使得以“布什主义”为命名的美国外交政策，重新回到了经典的基于实力的霸权模式。²⁴而在另一方面，小布什政府在构建经济霸权的战略时仍然坚持自由主义，亦即试图进一步巩固由其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的体系，利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来向外输出经济霸权。对于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小布什政府自然希望继续利用国际规则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利用多边框架来监督中国的行为。

然而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中美经贸的结构性矛盾也日趋突出，问题集中于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增长。在小布什政府任内，中美贸易逆差就从 2001 年 287 亿美元猛增至 2007 年的 1633 亿美元，7 年时间内增长了近 6 倍。这冲击了美国国内不少利益集团的利益，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因此受到了利益集团的阻扰。矛盾的一个主要爆发点在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上。²⁵由于美国的纺织品市场受到来自中国产品的冲击，在 2004 年，美国纺织组织全国委员会、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美国全国纺织协会等几大纺织品贸易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联合向政府施加压力，提出了具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利益诉求²⁶。首先，纺织服装利益集团联盟利用美国的大选，在大选期间向美国的有关部门提出“特保”申请并要求政府公开听证。其次，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选票寻找国会的代言人，在它们的游说之下，纺织企业集中各州的国会议员甚至组成所谓“国会纺织议员团”（Congressional Textile Caucus），与院外的利益集团遥相呼应。第三，利益集团将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和失业问题相挂钩，向美国公众展开舆论攻势并获得广泛响应，在大选期间主导了选民的意向。第四，利益集团进行大范围的游说，并组织大规模的司法行动，推动政府限制进口贸易品服装数量。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美国政府虽然仍在对华贸易政策中坚

²⁴ 这种模式参照“霸权稳定论”关于“霸权”的经典定义，即霸权不仅指涉一种超强的力量或实力，而且还视霸主有无行使其超强力量之意愿。参见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17 页。

²⁵ 关于美国对华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案的案情概述和原因分析，可参见陶明：《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国内体制、动力机制与案例分析》，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8—290 页。

²⁶ 关于在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美国纺织服装利益集团的具体行动策略，可参见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8—191 页。

持自由主义，但也对利益集团做出了妥协：在与中国纺织品贸易的相关协议中附加保护主义性质的条款，并且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救济的手段。这不仅使得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升级，还将争端引向了出口管制、人民币汇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问题上。

由此可以理清这一时期的美国贸易政治：小布什政府出于进一步输出霸权的“国家利益”考量，在对华贸易政策上仍倾向于坚持自由主义；然而由于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利益集团强烈要求对华实行贸易保护。政府与利益集团明显偏好不一，两大行为体展开了博弈。最终的结果是，小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仍然以自由主义为主导，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向利益集团妥协，在双边贸易中附加上不少具有保护主义性质的条款，在进口市场上设置进入壁垒，这使得该时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经贸争端持续出现。

（三）奥巴马第一任期：金融危机与贸易保护

2008 年，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同年，奥巴马政府上台。这一时期，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贸易政治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困境：在国内，美国的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经济跌入谷底。而在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使得人们对理想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产生了动摇，学界更是开始反思冷战后的国际体系，认为 21 世纪将是一个“无极时代”。²⁷彼时的美国，不得不面对霸权的衰落：金融危机固然是罪魁祸首，然而小布什政府时期滥用霸权也难辞其咎，当然，新兴经济体的乘势崛起对霸权同样形成了不小的挑战。那么为了维系霸权，美国想继续维持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就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新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开始偏向于保护主义。

同样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进出口市场均遭受重创，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且获得许多利益集团的支持。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的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集团攻击的目标。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轮胎特保案。2009 年 4 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简称 USW）以中国对美轮胎出口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发起特保调查。在此期间，USW 进行了诸多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捐款，院外游说，发动舆论等等。而作为 USW 上级机构的美国最大工会利益集团——劳联—产联，也不断展开政治攻势：由于在奥巴马参选期间，劳联—产联组织是奥巴马最为坚实的劳工选民基础，因此在轮胎特保案期间，劳联—产联抓住时机，要求奥巴马政府在涉及劳工

²⁷ Haass, Richard N.,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2008, pp.44-56.

问题上给予“政治回报”。²⁸结果是在是年的9月11日，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轮胎特保案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反映出当时众多利益集团的一致倾向，即是要求在对华贸易上实行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的声音，在当时各种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以及施压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都得到了积极释放。

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这一时期的美国贸易政治形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外部冲击之下，奥巴马政府出于挽救衰落霸权的考虑，开始谋求贸易保护主义；而国内利益集团为了保护集团的利益，更是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府与利益集团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决策上达成共识，保护主义的对华贸易政策由此形成：推行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通过“购买美国货”法案，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成为了这一时期美国贸易保护制衡的重点目标国家。

（四）案例总结：对华贸易政治之中的利益博弈

在本部分，文章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例，对“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检验。案例梳理了三届政府的对华贸易政治：在克林顿执政的末期，由于霸权的复兴，美国政府希望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因此也试图将中国纳入于这种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受惠于中美贸易，利益集团也要求进一步发展对华贸易。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趋同，因此对华 PNTR 法案得以通过，美国政府也积极支持中国“入世”。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出于继续输出霸权的考量，美国政府仍旧希望维持对中国的自由贸易；但是由于利益遭到美国对中国巨大贸易赤字的影响，不少利益集团开始呼吁实行贸易保护。政府和利益集团于是展开了利益的博弈，最终的结果是政府维持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主基调不变，在具体问题上对利益集团妥协，中美贸易频繁爆出摩擦。奥巴马上台之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的霸权衰落。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对外输出贸易保护主义来维系霸权，贸易保护主义也得到了广大深陷于金融危机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再次取得一致，而这回的结果则是，中国成为了美国贸易保护制衡的主要对象。案例的研究可以看出，正如“民主政府—利益集团”模式所分析的，美国的贸易政治主要是在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两大行为体之间展开，两大行为体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对华贸易政策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产物。

²⁸ 所谓的“时机”，是指2009年7月，奥巴马力推的医改方案受阻于国会，因此当时的奥巴马政府特别希望在相关贸易政策倾向方面能够平衡与国会的利益冲突。

结语：美国贸易政治的启示

本文通过“民主政府—利益集团”的分析框架，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案例研究，对美国贸易政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那么通过对美国贸易政治的研究，则可以挖掘一些积极的启示，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一，美国的对外政策需要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美国的贸易政策需要服务于其霸权战略。美国政府会根据美国霸权的变化情况对其贸易政策做出调整：当霸权兴起时，美国政府倾向于输出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而当霸权遭遇挑战或相对衰落时，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就会应运而生。因此，有必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考量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把握美国战略利益的底线，从而可以对霸权战略主导下的美国贸易政策形成全面的理解，并做出积极的应对。那么对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而言，拓展两国在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并将经贸问题上升到共同战略的层面，构建战略对话与互信，对于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美国的贸易政治具有“利益集团政治”的显著特点。在美国多元化政治的环境下，利益集团广泛地参与到美国的政治决策体系之中，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甚至能够驱动美国的贸易政治，左右美国的贸易政策。问题在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并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与国家经济的增长。²⁹在贸易领域，当大多数人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已成为一种铁律，那么“阻止或限制贸易会给某些集团带来好处，但受害的却是范围更大的社会。这些集团在强制实行贸易限制方面做得越成功，整个共同体的生活水平就越低，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越慢”。³⁰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要做的工作就是了解那些主导美国贸易政治的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把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微妙的平衡，开辟多轨外交，拓展共同利益，使它们成为推动中美经贸发展的积极力量。而对于美国而言，关键的工作是如何看待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从而构建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政治环境；如何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从而推出真正有利于公众福利的贸易政策。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由贸易是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与此相类似的是，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成员也能从自由的国际贸易中获益。总之，开放型的贸易，能够提高大多数社会成员以及大多数国家的福利状况和经济水

²⁹ 相关的论述，可参见曼瑟·奥尔森著，李增刚译：《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³⁰ 参见 I.M.戴斯勒著，王恩冕、于少蔚译：《美国贸易政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

平。因此，不仅仅对于中国和美国，对于世界上的任意一个国家都一样：都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拓宽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发展多边经贸关系，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如此，才能给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参考文献】

- [1] [美] 布莱恩·卡普兰.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M]. 刘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 [美] I. M. 戴斯勒. 美国贸易政治[M]. 王恩冕、于少蔚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
- [3] [美]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 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 [4] [美] 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 韦茨曼. 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M]. 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 [5] [美] 曼瑟·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M]. 李增刚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6] [美] 莫顿·A. 卡普兰. 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M]. 薄智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 [7] 沈本秋. 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分析——层次、视角与理论模式[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4）.
- [8] 盛斌. 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文献综述[J]. 世界经济，2001（1）.
- [9] 谭融.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0] 陶明.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国内体制、动力机制与案例分析[M]. 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1] 陶文钊.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M]. 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出版社，2006.
- [12] 王勇. 中美经贸关系[M].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 [13] 谢韬. 如何看待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 1973—2006 年期间的中国议案为例[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1）.
- [14] 张建新. 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 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6.

[15] Brennan, Geoffrey, and Loren Lomasky, eds. *Democracy and Decision: The Pure Theor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 Dahl, Robert Alan.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7]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18] Gibson, Martha Liebler. *Conflict amid Consensus in American Trade Policy* [M]. Washington, D.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 Haass, Richard N.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J].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2008.

[20] Putnam, Robert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 3, 1988.

[21] Ryden, David K. *Representation in Crisis: The Constitution, Interest Groups, and Political Parties*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22] Truman, David Bicknell.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M]. New York: Knopf, 1971.

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中俄能源合作研究

杨超越

【摘要】 能源合作是中俄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十几年的努力，两国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俄各自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也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提升了双方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契合度。当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旨在从当代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分析影响两国能源合作的多重因素，从而更好地认识该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 中俄能源合作；三大理论；机遇与挑战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A Study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Yang Chaoyue

【Abstract】 Energy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Sino-Russia relationship.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efforts, China and Russia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ir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oil and natural gas, which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both countries, but also expanded their common interests to a large extent, resulting in a tremendous improve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towards each other. Nevertheless, constrain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es, the Sino-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is facing some problems and barriers.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multiple elements affecting the Sino-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prism of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hence a clear account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constitute this cooperation will be gained.

【Key Words】 Sino-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social constru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uthor】 Yang Chaoyue, PhD Stud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一、导言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能源的利用已经成为支撑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世界各国，尤其是追求繁荣、稳定和安全的世界大国，都在努力寻找和建立可靠持续的能源来源或利益丰厚的出口路径。

受快速发展的经济的推动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能源的进口和出口领域拥有较多共同的利益。近些年，伴随着一系列涉及油田开发、管道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合同的签订，中俄两国在双边能源合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在过去十年的能源合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两国间也存在着误读和矛盾，一些冲突因素逐渐显现，给双边未来关系的发展也制造了一定的障碍。对于中俄这两个相邻的大国来说，建立和维护长期互信的合作十分重要，任何消极的单边举动或者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制止或者解决，都会给两国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带来损害，引起复杂而严重的后果。作为构成中俄大国关系的组成部分的能源合作，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其既有可能促使两国双边关系更加紧密，也有可能会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对后者的正常演变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影响中俄长期战略能源合作的积极因素，什么不是？”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此获得对中俄能源关系较全面的认识。在这篇论文中，所有对该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都将在当代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框架约束内进行。

二、新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中俄能源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是国际舞台上的两个强大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和世界体系的影响下，中俄两国都坚持将各自国家利益的实现作为与外国交往或者参与更广范围国际交往时的最根本要求，能源领域亦不例外。“在获得新的石油进口源头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使得中国领导阶层更加坚定地认为国际石油贸易并不完全受自由市场因素的支配，中国在国际市场获取石油并不能在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机制下得到完全保证。”^①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寻求更有效的方法，通过加大对国外能源市场的开拓、加强能源技术投入等方法，来消除因能源短缺而带来对本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俄罗斯追求稳定的能源出口以

^①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operated by Battel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 anatomy of China's energy insecurity and its strategies* by B Kong, Oct 2005, Page: 3. <http://www.ntis.gov/ordering.htm>, (Accessed: August 15th, 2013).

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在其对外能源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牵涉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Газпром）的 2005 年“俄乌斗气”风波、经由波罗的海直接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建立等等事件，被认为是俄罗斯利用自身能源“胡萝卜与大棒”（Carrot-Stick）政策反击西方对东欧进行颜色革命，并防止欧盟建立统一对俄能源政策的表现。^②总之，作为当今与西方发展路线不同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在涉及能源问题的国际关系活动中的表现体现出了它们各自的现实主义考虑。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以巨大能源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庞大经济体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保持了高速增长。尽管中国资源储量总量十分丰富，但是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拥有量均较低，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矛盾较为突出。更严重的是，为满足经济增长而进行的资源开发使得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其中一些破坏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③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中国逐渐将以往的以单纯 GDP 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注重效率、可持续性、环境保护为基本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发展观念的转变促使中国各经济领域在坚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从宏观上考虑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质量问题。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缓解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形势，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发展的优先目标之一。将来，中国将会更加注重提高能源安全水平，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由于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支撑，俄罗斯经济不仅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逐步走出了苏联解体后的衰退和停滞，还实现了连续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并以新兴经济体的身份跻身“金砖国家”行列。但是，俄罗斯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支柱是建立在对能源领域的投资和相关对外贸易之上，具有不稳定性、粗放增长、高污染、低技术投入等缺陷。另外，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俄罗斯向欧盟国家出口能源有着密切关系，而欧盟从自身能源安全考虑，正着手促进能源进口产地和进口路径的多元化，以摆脱对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依赖。“俄罗斯国内经济的稳定性(不管这一稳定性是否真正存在)与其向欧洲市场出口能源有着巨大的关系。”^④因此，俄罗斯将能源战略的发展重点转向亚太市场，不仅有助于自身减轻对欧盟进口市场的依赖，

^② Jeronim Perovic, “Russian Energy Power Abroad”, *Russian Analytic Digest* (33 / 08), ETH Zurich, http://www.css.ethz.ch/policy_consultancy/topics_INT/DetailsichtPubDB_EN?rec_id=1115, (Accessed: August 15th 2013).

^③ The information state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a Energy Policy 2012”, Oct 24th, 2012, <http://www.scio.gov.cn/zxbd/wz/201210/t1233774.htm>, (Accessed: August 16th, 2013).

^④ Karolina Kaptur & Roksana Rauk, “The EU’s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in the energy sphere-towards greater stability or increased vulnerability to threats?” Master thesis (unpublished), European Studies Master Program, Aalborg University, Aalborg University Library, April 2008, Page: 66. (Accessed: August 18th, 2013).

还能有效反制欧盟建立共同能源政策的努力,以防止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地缘政治影响力被弱化。作为亚太能源市场的主力军,中国对俄罗斯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所以俄罗斯十分需要中国的能源市场。加大对中国的能源出口,是俄罗斯走出当前国内经济困境,摆脱对欧盟市场过度依赖的一条“捷径”(shortcut)。^⑤

中俄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推动了双边能源合作的发展。双方对国际关系活动中重大问题的共同看法,对发展各自国家经济的高度重视,相互之间存在的利益互补性,等等因素,是中国和俄罗斯走向共同的能源合作道路的助推器。一些西方观察家将这一关系定义为“有着能源商品的俄罗斯和有着廉价劳动力和制造业优势的中国之间的巨大利益互补”。^⑥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以纯粹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合作关系都会受到共同利益可持续性这一条件的严格限制。国家利益的分道扬镳或者不完全重合有可能导致合作关系的中断或者退化。如我们今日所见,国家利益也并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唯一因素。2005 年的中俄“安大线”争端被认为是两国能源合作中的龃龉的体现,导致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新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所能完全解释的。此外,中国在中亚能源市场的积极开拓也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会导致与将此区域当作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发生冲突的事件,两国在中亚能源市场是合作共存还是相互排挤,除了单纯的国家利益外,同样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总之,在新现实主义视野下,中国和俄罗斯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只要两国能够共同努力,积极寻求合作,就能够建立和促进双方的长期互惠合作关系。反之,两国如果缺乏共同利益,或者缺乏对这种利益的关切和维护,那么任何一方或者双方的利益格局的变化,都会对中俄能源合作产生不可避免的危害,甚至可能会使得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演变成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

三、新自由视野下的中俄能源合作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一样,并不否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然本质,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同时又强调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跨国合作的可能性以及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学

^⑤ Erica S.Downs, “Sino-Russian Energy Relations-An Uncertain Courtship”,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edited by James Bellacqu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Dec 22, 2009. Page: 157.

^⑥ Anders Aslund, “Sino-Russian Energy Relationship in Perspective” by Kevin Rosner, *Journal of Energy Security*, Sept, 2010, http://www.ensec.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0:sino-russian-energy-relations-in-perspective&catid=110:energysecuritycontent&Itemid=366, (Accessed: August 19th, 2013).

者重视国家间的“双赢”，更加关注国与国交往时各国能否同样获得利益，而不是哪一国获得的利益更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人类对化石能源更深和更广程度的开发利用，国际能源体系经历了持续而快速的发展。成熟的能源进出口体系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任何国际能源贸易的参与者都会受到现有体系和规则的影响与制约，作为能源市场中的重要参与者的中国和俄罗斯亦不例外。

于 2003 年被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的《202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中，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能源市场合作成为了新的发展目标。《战略》认为：“俄罗斯国家能源政策必须为将俄罗斯从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国转变为世界能源市场的重要成员……，保证该国为世界经济中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而服务。2020 年前，俄罗斯的参与将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新因素，俄罗斯将以能源资源的庞大供应国的身份，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⑦进一步说，俄罗斯将通过开发亚太能源新市场、促进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的方式，防止对世界某一能源进口市场的过度依赖，提高能源出口的稳定性。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和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将是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具有繁荣前景的天然气、石油、能源、原子技术和燃料与核能产品销售市场。亚太地区国家在俄罗斯石油出口中所占份额的比例将从目前（指 2003 年）的 3% 升至 2020 年的 30%”。^⑧由此可见，俄罗斯十分重视亚太能源市场的广阔前景，将中国排在主要经济合作伙伴第一位也表明其对中国能源市场的高度重视。

可以预见的是，新自由主义因素将会对俄罗斯未来针对他国的能源政策施加更多的影响。因此，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将会与市场机制、价格、出口量和其他相关因素保持着高度密切关系。受到西方话语权下的国际能源体系和俄罗斯自身能源市场一些缺陷的巨大影响与限制，俄罗斯联邦政府进一步调整了其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态度，并努力地将自身打造成这一现行制度中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俄罗斯的能源市场活动也会更加地接近西方的标准，并更全面地融入现行的能源体系，更多地受其影响和制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俄罗斯能源工业及相关产业将会经历一次具有革命性创新意义的改革，而这将会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其与中国在多个层面的能源合作。在俄罗斯面临发展能源工业的新要求的同时，中国的能源市场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挑战，能源工业基础设施存在的缺陷、价格改革的滞后、经济发展

^⑦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20*, Moscow, 2003, Page: 12, <http://library.arcticportal.org/631/>, (Accessed: August 19th, 2013).

^⑧ Ibid.

的压力、运输体系的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⑨等问题，这使得中国在提高其能源工业水平方面拥有较大的空间。

对于中国来说，一个稳定可靠的能源市场对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在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中国能源供应满足市场需求的压力逐渐加大。为解决这一问题，求得能源行业的发展，中国通过与国际能源市场进一步融合，来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水平和发展可持续性。在 2012 年发布的《中国的能源战略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完善了发展能源市场的指导方针。根据《白皮书》，中国的持续繁荣与全球能源市场密切相关，世界经济的复兴也关乎到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已与俄罗斯、欧盟、美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等国建立和加强了能源合作关系，并以成员国或者重要活动参与者的身份在重要国际能源组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世界能源委员会和国际能源论坛都有中国代表的身影。同时，中国还非常重视与国际能源机构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关系。通过在合作中贯彻能源市场机制要求，并尊重国际准则的要求，中国将国际合作作为在国际能源市场实现双赢的重要方式，并与其他国家积极合作，共同遏制国际能源市场中垄断的出现。^⑩

通过对中俄能源政策进行总体比较，可以看出两国都对基于信任、互相尊重和双赢的国际合作有着高度重视。尽管在合作的具体活动中存在个别利益相悖甚至冲突，但中国和俄罗斯有着广阔的可以促进双边能源合作的空间。中俄两国在由西方主导的、长期存在的现行国际能源体系中将如何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和俄罗斯不仅应将自身充分融入现行能源体系，还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共同努力，促进该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四、社会建构主义视野下的中俄能源合作

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看，中俄能源问题是中俄两国之间相互认知的产物。在建构主义理论中，相互认知、历史偶然性和社会规范被认为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因，而非其他理论所强调的人性或者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等等。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的参与者受

^⑨ Hengyun, Ma & Les Oxley, *China's Energy Economy: Situation, Reforms, Behavior, and Energy Intensity*,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2. Page: 79-82.

^⑩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China's Energy Policy 2012*, Oct 24th, 2012.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778/7990121.html>, (Accessed: August 23rd, 2013).

对他者和自身的认知的驱使而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作为经济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问题因与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密切相关，而受到各国高度重视。朱迪斯·戈登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当观点将规范的或者平常的信念具体化，且后者使得参与者对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影响没有独特的对等力量存在的战略环境的产出，并且逐渐在政治体制中扎下根来的时候，观点就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¹¹。因此，中俄两国政府和民间对对方的认知，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认知，会对两国的能源合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回溯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中俄两国的交往在民众集体记忆中并不十分令人愉快。比如在近代，清政府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段历史依然被很多中国人视为近代史上的国耻。尽管中俄两国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意识形态的相近而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中俄之间的敌视和对抗仍然在两国近现代关系史上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总之，中国和俄罗斯之间针对对方的刻板认知是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互动的产物。两国在 18 世纪-19 世纪的初步接触在民众头脑中打下了最初的烙印，而 20 世纪的友好和冲突关系则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增强了两国相互认知。因此，可以说当代中俄关系仍然受到在过去事件下形成的“印象”的影响，这种影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改变或消除。如俄罗斯汉学家亚历山大·卢金所说：“观念的演变总是包含着强烈的连续性。新观念的产生并不是没有来由和根据，它是深深植根于已经存在的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因此，‘变化’只有通过修正旧有观念才可能发生。”¹²

在当代国际秩序中，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包含了诸多方面，例如维护国家主权、建立互惠和民主的多极体系，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地区安全和一体化等多方面内容，等等。这一认知，客观上也是促进中俄伙伴关系向着更成熟状态发展的有力催化剂。如果民间和政府层面的交流能够得到更长远的发展，那么中俄两国的相互认知在可见的将来是可以得到改善的。由此，长期、互惠、可持续发展的中俄战略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以建立并得到提高和巩固的。

五、结论

¹¹ Judith Goldstein &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ge: 3.

¹²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 E. Sharpe, Inc, New York, 2003. Page: 313.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会释放更多的潜力和活力。目前，中俄两国都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交流合作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深化和加强。能源问题作为中俄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将会得到两国领导人的更多重视。

从三个不同而又相关联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未来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面临以下机遇和挑战：

首先，能源合作建立在两国拥有的以能源作为杠杆促进各自经济发展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一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现实主义政策是当前推进中俄能源合作的强有力“发动机”，并且在未来也仍将会是将中俄两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只要能源供应和能源需求二者并存，跨国的能源合作就可以被建立和维持下去。中俄在巩固能源合作中对相关机构和机制的完善将会进一步带动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其次，中俄两国都是实力雄厚，且并不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马首是瞻的世界强国。两国都在努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十分注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当前，由于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以及国与国联系越来越紧密趋势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对繁荣强大国家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各自国际化程度的高低密切相关。经过长期转型，中俄对于在当前体系约束下处理国际问题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得心应手。尽管西方主导的能源体系已变得日趋成熟，但其中一些不完善的机制依然不能确保参与者共享公平和繁荣，也不能确保许多国家，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在其中的期待和努力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现存能源体系的运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关注点或者利益的不相一致，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也会在中俄现有国际能源体系的合作中出现，因此，两国都应注意可能的冲突的出现，并共同为防止其恶化为对抗而努力。

最后，作为中俄总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未来在能源事务方面的交往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民间交流、文化交流和政府间合作等因素的影响。为了实现共同繁荣的伟大目标，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原则应该在两国政府和民间层面得到更多地贯彻。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巩固的、稳定的、长期的、充满活力的中俄能源合作制度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并得到更长远的发展。